



《记忆》131 期

目 录

【专 稿】

王海光 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一打三反”个案研究

【要有光】

依 娃 胡杰大饥荒组画的视觉冲击

依 娃 我是逃荒者的后代

【随笔】

启 之 套话种种——“红色话语”小议之四

【札记】

胡庄子 读萧军《延安日记》（五）——萧军笔下的延安文化人和文艺界

【序跋】

丁 东 究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文革在山西》序

何 蜀 民间研究文革的可喜成果——《文革在山西》序

【述往】

朱 特 插队的那些事（十一）——夜半对歌

安希孟 我丧失过阶级立场

【资料】

1.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2月22日）
2. 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3月22日）
3.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3月27日）

【编读往来】

1. 江东、郑大丰、元元谈《记忆》的封面设计
2. 本刊编辑部说明并致歉

【版权声明】

【专稿】

一个小学教员的反革命案

——“一打三反”个案研究

王海光

内容简介：柳福禄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员，地主子弟，“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回农村接受“再教育”。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柳福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课堂上公开污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袖，在家里毁坏毛泽东像，不但本人被关押，全家都受到逼供审讯。这个“现行反革命”案件完全是无中生有制造出的假案，但具有多重视角：不仅反映了文革对法制的毁坏、案件审理的非程序特点、“现行反革命”案的处理过程，还可以从中看到文革造成的农村邻里关系的紧张、小学教育的劣质化等社会底层现象。这种平民视角的案件，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文革社会的真实面貌。

关键词：农村文革 “四类分子” “一打三反” “恶攻罪”

1970年2月6日，是中国农历庚戌年春节。春节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即便是在那个政治“火热”而生活萧条的年月，老百姓也尽其所能地在这个节日里为自己营造一点喜庆，享受几分温馨：一家喜气洋洋，老老少少团聚一堂，包饺子，喝大酒，穿新衣，放炮仗……，尽享天伦之乐。然而，吉林省海龙县红山口公社和平二队柳福禄家的这一年春节，却是过得凄凄惨惨，栖栖遑遑——在2月4日（农历腊月28日）的这一天，户主柳福禄被公安机关带走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他的全家老小在泪水涟涟中，度过了这个充满恐惧煎熬的年关。

柳福禄，35岁，是当地一位小学教员，已有10多年教龄了。柳福禄不仅是一名工作认真的教师，也是一位挚爱妻子的丈夫，一个孝敬长辈的儿子，四个孩子的父亲。但就因为他有了一个地主分子的父亲，是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的“黑五类”子弟，这在文革中就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厄运。

在文革中，因为出身地主家庭，又是小学高年级的任课教师，柳福禄自然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在十几岁学生们黑白分明的眼里，家庭出身是揭不掉的阶

级烙印。他们把柳福禄看成是混在教师队伍的敌对分子，心怀叵测的阶级敌人，给他找各种各样的茬子，百般刁难，千般挑剔，无限上纲，给他贴大字报，开他的批斗会。把他轰下了讲台，还给扣上了对贫下中农子弟搞阶级报复的大帽子。在“斗、批、改”阶段，公办小学全部下放农村。柳福禄被下放回家，丢了公职，当了农民，被迫中断了十几年的教学生涯。

1969年10月，柳福禄又祸从天而降。他在给当地小学代课的过程中，给学生听写生词时，一个不会写的学生当场捣乱，把默写的字词说成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袖恩维尔·霍查”的不敬，找出理由拒绝听写。这件事本来是一个顽劣学生无理取闹的捣乱行为，但当地大队革委会把它上纲为政治事件，把柳福禄重新赶回生产队劳动。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当地大队革委会又把这件事拿了出来，说柳福禄“在课堂上借给学生考试之机散布反动词句”，“利用合法的课堂搞反革命政治活动”。不仅如此，大队革委会的领导人还利用柳福禄与邻居的矛盾，无中生有地揭发出他家墙上挂的毛主席像被人用针刺了，说这是他们发泄阶级仇恨的现行反革命行为。他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再加上为地主老子翻案等罪名，罗织构陷，无限上纲，硬是搞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案件。柳福禄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报送专政机关逮捕。

为了获取认罪的口供，专政机关对柳福禄反复突击审讯，进行了种种恐吓逼供，交给群众大会批斗，最后被关押到县劳改队劳改。他的妻子、父亲和孩子也都遭到审讯逼供，饱受惊吓。

随后，在案件审理的复核过程中，审案人员经过重新调查，给柳福禄罗织的这些罪名都查无实据，“现行反革命案”不能成立，遂将刘释放回家。这场飞来横祸，使柳福禄全家老小备受折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文革结束后，柳福禄向中共海龙县委和教育局提出申诉，讲述了自己的不白之冤。1979年2月，海龙县公安局复查了他的案子，正式发文给他平反。

柳福禄的这起反革命政治案件，是成千上万“四类分子”家庭在文革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一个缩影。关于“四类分子”在文革中的悲惨境遇，极端的有对“四类分子”满门抄斩的暴行，如北京大兴惨案、湖南的道县屠杀等，但更普遍的是那种密不透风的政治迫害，喘不过气来的政治压迫。柳福禄反革命案的这个事例，并不是那种鲜血淋漓的残忍屠杀，但更具有当时日常生活的政治逻辑，是那种更

常规更普通更经常更为人们熟悉的政治性人身迫害。

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特别偏好精英阶层的历史，帝王将相的历史，而对民间社会、草根阶层的历史往往忽视。现在的文革研究中，这种倾向也是很严重的。人们的关注的重点都是高层政治活动，关注的人群都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这是失衡的历史观。其实，从人权的意义上说，相对于刘少奇、林彪的文革命运，这些“四类分子”及其家庭的文革命运，更令人同情。这里所说的，还并不是什么草根情结的问题，而是如何全面地认识历史的问题。

在文革中，虽然干部阶层是受冲击的斗争对象，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其家庭子女也受到牵连，不同程度地遭到了迫害。但他们遭受的迫害与“四类分子”还是不能比的。干部及其家庭成员受到的迫害，是荣辱与共的大起大落。虽然台上台下的境遇落差很大，但时间很短。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干部政策的落实，被打倒的干部也就相继被“解放”出来了。从整体上看，干部阶层的境遇命运，无论如何颠沛流离，是要高于一般平民的。而“四类分子”及其家庭则不同。无论运动如何发展，国家政治贱民的身份，都是他们不可改变的宿命。他们缺乏基本人权的保障，在社会最底层苟延残喘，战战兢兢地生存，但是还不断地有无妄之灾降临到他们头上。

在文革初期的造反动乱阶段，“四类分子”非但没有参加运动的政治资格，还要被当做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在某些斗争极端的地方，“四类分子”及其家庭成员还遭到了有组织的集体屠杀。在文革的治乱过程中，“四类分子”又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垫脚石。政权要通过对他们的专政，重新恢复社会的政治秩序，再度确立起自己的权威。所以说，他们是真正的给文革运动垫底的社会阶层。这些人的生活境遇如何，不仅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文革政治潮流的涨落；同时更能直接反映出文革中底层社会的状况，从这场运动对人的戕害程度来看它在人类社会文明史上的刻度。

柳福祿的“现行反革命案”，发生在“一打三反”时期，是在动乱后重新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通过这个案件的微观视角，不仅可以看到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形成，还可以看到文革对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影响，还可以看到农村基层政权在由乱转治过程中如何用阶级斗争方式重建权威的。

本文所用的材料，是王锦思先生收集的吉林省海龙县公安局刑事档案中“柳福禄反革命案”的全宗。该全宗共有500页。内容有调查材料、审讯记录、综合报告、证人证言、核实材料、处理意见、本人申述、公安局平反决定等等，共有150份原始档案材料。从犯案、审理、复查、平反，整个过程都有详细的文档材料，涉及有名有姓的人员约40人左右，案件内容相当完整。当事人有非常好的叙述能力，事情经过及其心理活动，都讲述得非常详细。特别是案卷中还附有所谓“针扎”毁坏的毛泽东像的“罪证”原件，尤其难得。如此系统、完整的“现行反革命”档案，在社会上是比较少见的，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笔者试图通过这个案卷，尽量完整复原当时的具体历史场景，力求在两个研究维度上有所发掘：一是揭示文革对整个政治生态的恶化，特别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文革中的人权状况；二是文革时期所发生的政治案件的性质，侦破和审理的整个过程，以及如何定案的各种政治因素。

本文对“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剖析，是要从农村社会微观政治的视角出发，梳理出两条线索的交互关系：以透视文革中底层民众的政治社会生态为主线，以“恶攻”类政治案件的发生和处理过程为复线。

一、小学教师柳福禄和他的家庭

柳福禄生于1935年6月13日，吉林海龙县六八乡同心村人，家庭出身地主。1950年柳福禄在本村小学读完了初小后，就外出就学，在县府所在的梅河口镇读完了高小。高小毕业后，到吉林市读的初中。就读学校就是吉林省著名的吉林铁中。¹这个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规范，师资力量强，学生质量高，至今还是吉林省最好的优质中学之一。

1955年7月，柳福禄初中毕业，遂回到家乡务农。此时，同心村已经组织了农业合作社，柳福禄在社里劳动了半年，1956年3月就到当地小学教书。先是代课半年，随后转为正式教师。1957年10月到12月，柳福禄参加了海龙县的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

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的10多年间，柳福禄先后在当地6所小学任过教。柳福禄在学校工作很努力，听从领导安排，从不迟到早退，同事们对他都有

¹ 柳福禄1969年自写履历。

很好的印象。¹

1962年，柳福禄在和平村任教期间，将全家由同心村搬到了和平村。

柳福禄与父亲柳长年住在一起，全家7口人。妻子王淑兰与他同岁，娘家出身下中农。他们1956年结婚，夫妻感情甚笃，生育了四个孩子。在1970年初柳福禄被当成“现行反革命犯”押走时，他们最小的孩子才一岁。柳福禄的父亲柳长年，1914年生人，在生产队务农，是被监督劳动的地主分子。

王淑兰是一个很本分的农村妇女，与邻里的关系都处得很好，在村子大家都对她有好印象，认为这个媳妇是和善人。但王淑兰就是与公公的关系不好，经常找茬给他吵闹。这不难理解，公公的地主成分，拖累了丈夫和全家，使他们活得很憋屈，让她心里很不痛快。她时常会把气撒到公公身上，摔盆子摔碗，有时还不给他做饭吃。柳福禄非常孝敬父亲。每当遇到妻子与父亲吵架时，他总是站在维护父亲的立场上训斥妻子，结果是夫妻俩大吵一顿。这种吵闹虽然经常发生，但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夫妻感情。他们吵架的原因，都是善不善待父亲的问题引起的。所以即使吵得很凶，夫妻俩也从来没有说过离婚之类的狠话。

柳长年的地主分子成分不是土改时划分的，而是到1953年给补划的，主要是政治因素。按官方的权威定义，“家庭出身”是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的家庭阶级成分。柳家祖上，曾是当地很有些名气的大户人家，同心村“东西柳家”的东柳家。在柳福禄爷爷一辈，家境还很殷实，到收租子的时候，成车往家拉粮食。他父亲柳长年是过继给他爷爷这一房的。分家时，柳家还有一些土地。柳长年年轻时喜欢耍钱（赌博）²。分给他的土地，让他卖的卖，押的押，很快就所剩无几了。到土改前6年，柳家已经是破落到普通人家，只剩下21亩土地，3间草房了。³柳长年靠种菜园子谋生，虽然家境过得比一般农民略好，但也没有发展起来。儿子柳福禄从小跟他干活，12岁才上小学。这已经是共产党来了以后，1947年的事情了。

海龙县是中共在东北占领最早的地区。1946年1月中共东北局设在海龙县，曾召开了著名的梅河口会议。海龙县的土地改革开始很早，1947年就搞了土改。当时海龙县的土改政策规定，只有贫雇农才能加入农会，后期也允许表现好的中

¹ 关于柳福禄日常表现座谈会记录，（建设小学），1970年12月26日。

² 老贫农座谈会。1970年12月27日。

³ 审讯柳长年记录，1970年2月21日。

农加入，地主、富农是绝不允许参加农会的。¹在土改时，给柳长年评定的成分是“中农”。柳长年幼年读过6年书，有些文化，能说会道，在土改中表现十分积极，不但加入了农会，还当了干部，在联社里担任文教委员。

柳长年当了干部后，似乎有些忘乎所以，傲慢自大起来。他自己讲当时“积极往上爬，一心想入党”。²但好景不长，因为手脚不太干净，在“三五反”运动中，把他定为贪污分子。1953年，柳长年被处理，新账老账一起算，给他补划了地主分子的成分，开除出干部队伍，回乡监督劳动。

从经济状况说，柳长年应属于破落地主。按照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者，应予改变成分。”以柳长年的情况看，更符合戴坏分子的帽子，而不是地主的帽子。

平心而论，柳长年的地主分子帽子，并不是因为他真有过什么“剥削”，最主要还是他自己的不当行为所致。实际上，他对戴地主的帽子，心里是很不服的。他私下给儿子说：他当干部时，人际关系没搞好，得罪了一些人，被他们打击报复了。柳福禄相信他父亲的说法。但据柳长年在文革中的交代说：他那时“像旧社会的官僚一样压迫人民”，做了一些“对人民不利的事情”。³

1960年2月，海龙县对全县“四类分子”进行评审。由各生产大队向公社报送“四类分子”评查意见，由公社党委审批。评审对象分为四类：正式社员、非正式社员、监督劳动、依法管制。柳长年原为非正式社员。他所在大队党支部、管理区党总支的评查意见都是“管制生产”。公社政法部和公社党委的意见是：“应批判斗争，斗争后给予监督劳动。”⁴当年，海龙县全县共有评审对象2708人，经过评审定为正式社员924人，非正式社员597人。监督生产538人，依法管制的59人，未定的590人。⁵对柳长年监督劳动的处理，应属于比较重的一档。

但是，柳长年戴的地主分子帽子，并不是只戴在他本人的头上，而是压在全家人头上，子女都要受到牵连，政治前途暗淡。柳福禄自然也受到了父亲地主成分的株连。尽管他工作努力，教学认真，业务能力强，但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虽然在许多学校工作过，始终没有发展。他自己对此也有抱怨，认为要是解决了

¹ 《梅河口市志》，1999年，第255页。

² 柳长年的《交代书》，1969年9月13日。

³ 柳长年的《交代书》，1969年9月13日。

⁴ 地主分子柳长年档案，五类分子评查审批表，中共吉林省海龙县六八石乡基层委员会，1960年2月19日。

⁵ 《梅河口市志》，1999年，第206页。

家庭出身的问题，他就能当上学校的教导主任了。¹

1964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后，县社教工作队到和平村蹲点。社教工作队在村里召开社员大会，传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精神，宣读有关文件。柳长年在会议上仔细听了社教工作队宣讲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他们宣讲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的文件，让他看到了改变地主成分的希望。这份1950年的文件说：“构成地主成分的时间标准，以当地解放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分。”他满心欢喜地认为，可找到改回成分的文件依据了。

柳长年回到家里，给儿子柳福禄说：按照这个文件，咱们家的成分不够地主。咱们家在1939年分家前有土地81亩，后来押出了60亩，已经丧失了土地所有权。我从下学就干活，也没有干过人家（意思没有发家致富）。按土地数量，咱家不够地主。咱们家也没有吃过租子。文件上讲得明明白白，按土改时前三年的土地算。别说前三年，前六年咱家就是这个样子。柳福禄问他爹：那怎么给咱划的地主？柳长年说：是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给划的地主，那时国家的规定咱也不知道啊。按这个规定，咱家不能够的。他们父子两人商量，看看能不能把成分给改过来。

柳福禄巴不得甩掉这个家庭包袱。听了父亲的话后，柳福禄找了他工作的团结小学负责人张维新咨询，说了他家庭的情况：他父亲土改时的成分是中农，后来因为人缘不好又划成了地主。张说：土地不够是不能评地主的，评地主是根据剥削程度，不是根据人缘。你的情况是可以改的。于是，柳福禄找到社教工作队负责人叶显道（解放军干部），给他讲了他们家的情况，说他家应定中农，定为地主不合理。叶告诉他：“要相信群众，相信党。”²这显然是敷衍的话。柳福禄还找到了大队干部蒋德春、党员蒋德州等人，要求改家庭成分。但并没有结果。

柳福禄家是从同心村搬过来的，改成分的事情必须通过同心村，情况比较复杂。许多老人知道原先他家在二道岗有几十顷地，让柳长年抵了赌债，破落地主也是地主。其实，即使把柳长年的地主分子改为坏分子，还是“四类分子”。这样，柳长年的地主成分非但没有改成，而且在文革中又成了柳福禄为地主老子翻案的罪状。

¹ 柳福禄讯问笔录，1970年1月3日。

² 张维新调查证实材料，1970年2月21日；柳福禄讯问笔录，1970年1月3日。

二、文革与农村政治生态的恶化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给农村的熟人社会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给邻里关系制造了新的紧张。乡间邻里经常发生的生活摩擦，鸡毛蒜皮的计较，家长里短的事情，都被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在这种以政治原则统治生活伦理的社会关系中，百姓日常生活免不了磕碰，就变得无法调解，甚至不断上纲上线，使问题的性质越来越严重。邻里之间，一旦抓破脸，你咬我，我攻你，翻来覆去，越演越烈，不断升级，最后形成势不两立的死磕局面。柳福禄邻里关系的恶化，就是这样演变的一个例子。

柳福禄一家人1962年落户到和平大队，与村民的关系很融洽，与邻里相处的都比较好。特别是他们的三家邻居，在村子里都是有名的难缠户，但与柳福禄家相安无事。村民们都称赞柳福禄的妻子王淑兰老实，是不生是非的本分人。

地主分子柳长年在和平大队也有些人缘。柳长年读过几年书，肚子里有些墨水，善于表达，语言能力很强，能一套套地开讲“包公案”、“刘公案”、“施公案”¹的旧小说。²这在文化生活贫瘠的农村是很受欢迎的。许多青年人喜欢听他唠嗑，大爷长大爷短地喊着，让他很是受用。柳长年嘴上闲不住，经常说些闲话逗乐，是农民中好显摆的人物。如1964年清明节，学生去烈士墓扫墓，柳长年说“这些人不够一炮轰的”。见到来村里修补箩筐的小商贩，他也去说些消遣他们的顺口溜，博人一笑。村里人都感到这个老头说话有意思，幽默有趣，愿意听他扯闲篇。

柳长年生性好说，口无遮拦，喜欢“瞎摆活”，风趣幽默，时不时蹦出几句风凉话，是说相声演小品的材料。今天看来，他活脱脱就是目前当红的农民笑星赵本山的前生翻版。但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就是在胡说八道，不老实了。村民们反映：柳长年的毛病是爱说些“屁话”。³其实，柳长年也很清楚自己嘴上的毛病，但改不了。这是性格使然。从政治上说，这是一个好说好动的“四类分

¹ 《包公案》、《刘公案》、《施公案》都是民间流传非常广的说唱演义话本。《包公案》的主角是宋朝的名臣包拯，讲包拯公正不阿、秉公执法的办案故事；《刘公案》的主角是清朝名臣刘墉，讲刘墉评断冤案，惩办贪官污吏的故事；《施公案》的主角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名臣施仕纶（施世纶），讲他在江湖好汉黄天霸协助下捕盗办案的故事。这些话本在农村传统社会中，承担了进行忠孝仁义的教化任务。

² 柳长年：《交代书》，1969年9月13日。

³ 老贫农座谈会，1970年12月27日。

子”。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给“四类分子”带来了灭顶的灾难。在城市，无数“四类分子”被殴打，被抄家，被赶到了农村。在农村，“四类分子”作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大会小会都要拉去批斗。通过斗争“四类分子”，一方面可以给农民群众以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现实感；另一方面还具有震慑农民群众的警示效应，便于在农村推行一些剥夺农民利益的极左政策。

地主分子柳长年和村里的其他“四类分子”，自然也是和平大队的阶级斗争道具。除柳长年外，和平大队还批斗了其他“四类分子”，如搞外快的徐木匠、坏分子许连玉等人。因为柳长年是刚搬来不久的外来户，对他的斗争可能比其他人更严厉。柳长年过去给大伙讲的传奇故事和调侃的话，则被当做是阶级敌人“放毒”的现行罪状，予以严厉批判。

当时，农村基层干部为了压制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倾向，强收农民的“小开荒”地，限制“自留地”，首先是拿这些“四类分子”开刀，以震慑其他人。

60年代初的大饥荒，各地农民都自发采取了各种自救措施。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许多农民为了谋生，在集体土地之外又自己另开一块荒地耕种；在耕作自留地时，也尽量往外边开，扩大一点种植面积。这种开“小片荒”和自留地“镶边”的情况，在东北农村非常普遍。地主分子柳长年也随大流，在屋后搞了一小片地种上了地瓜，自留地也扩大了四条垄，有三丈多长。这些农民的自发活动，农村各家各户都在搞，法不责众，心照不宣，算不得什么事。但在文革中，这些活动都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强制农民把自己开出的“小片荒”收归集体。为了把农民好不容易耕作出来的土地白拿过来，生产大队杀鸡给猴看，首先拿“四类分子”开刀，以儆效尤。生产队组织农民群众对地主分子柳长年进行了批判，没收了他在自家屋后开垦的种了500多棵地瓜秧的地。同时，队干部告诉柳长年，这块地虽然没收了，但管理这块地的事情还是要他负责，到收获时再由生产队另派人去。这是1967年的事情。

批判斗争柳长年和村里其他“四类分子”，这是农村中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程序，发动群众的重要步骤，每个村子都会开展这样的批判斗争。更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斗争背后，是对农村社会原有人际关系的破坏。文革农村的阶级斗争，

不仅制造了政治关系的紧张，还制造了邻里关系的紧张。邻里间一些家长里短的口角摩擦，在阶级斗争的语境下，都会引入到政治问题上去，被无限放大，甚至成为致命的政治罪行。

在地主分子柳长年被批斗的同时，柳福禄的地主子弟的身份也在强化。文革一开始，就突出强调了“黑五类”子弟的政治贱民身份，给柳福禄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一连串的麻烦。他在小学的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

文革初期，教师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出身不好的教师，更是被学生整治的目标。中小学的十几岁的孩子，正是在懵懵懂懂的青春萌发期。他们往往以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出身不好的教师，在他们的言行中挑剔出阶级敌人的动向，整治的方式花样百出。柳福禄教的是小学高年级，接连发生了各种事情。

文革开始时，柳福禄在县城参加小学教师集训。结束后，他分配到同心小学教学。

1967年底，学校“复课闹革命”，重新开学。柳福禄所在小学也复课了。但是，在社会上跑野了的学生，很难收心回到课堂。在柳福禄负责的教学班上，几个调皮学生站在课桌上乱蹦乱跳。柳见状，训斥他们“你们要造反哪？”有几个学生知道柳出身不好，向校方告状，说他责骂贫下中农子弟。校方没有理会。

在农村小学，不好好学习的顽劣学生多，教师往往要采取严厉方式“镇”住他们，维护教学秩序。农民家长们都理解和支持老师的做法，认为这是严格负责的态度。有的家长还要求教师更严格管教自己的孩子，可打可骂。但在文革中，这些做法就因人而异了。在出身好的教师那里，这是正常的教学管理。而在出身不好的教师那里，这就是打骂贫下中农子弟的阶级报复行为。柳福禄也因此被扣上了阶级报复的帽子。

东北冬天很冷，教室都得生炉子。1967年12月的一天早上，柳福禄给学生生炉子，没有引火柴，看到在教室地上有几张沾满泥水的毛主席语录，是前任班主任写的，他放到炉子中当引火柴烧掉了。当时有学生说，毛主席语录怎么能烧呢。他说，弄脏了，不能用了。这个班上有转来的几个学生，知道刘是地主子弟，有意给他找茬。课后，给他贴了大字报，说他对毛主席不敬。学校方面调查了情况后，认为学生捣乱，给柳福禄调换了教学班级。¹随后，柳福禄勉强干了一个

¹ 柳福禄审讯记录，1970年1月30日10时；柳福禄审讯记录，2月1日5时；建设小学《关于柳福禄日常表现座谈会记录》。1970年12月26日。

来月，实在干不下了，就调到了建设小学。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大队的小学教员侯振民、王庆余的建议，并在报纸上组织了一场大讨论。侯、王建议：全国的公办小学放到生产大队来办。小学教师都回本大队，国家不再发工资，由大队给他们记工分。《人民日报》组织这场公办小学下放的大讨论，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反对意见的。短短时间，全国农村的公办小学都下放到了当地的生产大队，由大队来办。

1968年12月，柳福禄任教的建设小学也下放了。他回到大队，先办了7天学习班，然后到第二生产队劳动，下地干农活。柳福禄由拿国家薪水的公办教师，变成了拿工分的农民，由脑力劳动者变成体力劳动者，名为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三、柳福禄的邻里关系恶化

柳福禄家的邻居有刘德财家、徐连友家和李成江家。这三家成分都是贫农，劳动都很差，干活偷懒耍奸，为工分拼命争闹。李成江家还好沾点小便宜，有机会就要捞些集体的东西。徐连友更是村子里有名的耍人，好赌博耍钱，动不动就跟人吵闹。¹但是，在文革前，他们邻里之间一直相安无事，经常来往。柳福禄的媳妇王淑兰，与徐连友的媳妇朱玉兰年龄相仿，每天抱着孩子相互串门，做做家务，聊聊天。

文革开始后，随着柳福禄的政治贱民身份的不断强化，他与村民的邻里关系也不断恶化。柳福禄的邻居刘德财、徐连友，因为出身成分都是贫农，在政治上有恃无恐。随着文革对出身成分的强调，他们的腰杆子也越来越硬，行为也更加横蛮。50岁的刘德财还当上了和平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委员。

文革之初，柳福禄几家邻居还有正常来往，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1968年下半年，在清理阶级队伍后，柳福禄的邻里关系也骤然恶化，各种矛盾纠纷都来了。待到柳福禄从公办小学教师下放回家成为农民后，他的邻里关系下降到了谷底，冲突的性质也不断升级。

柳福禄回到村子里接受“再教育”，但村民们仍把他当作知识分子看，还是

¹ 老贫农座谈会，1970年12月27日。

有些敬畏感的。柳福禄对父亲很有感情。队里批斗柳长年，喊打倒的口号，他是不喊的，还拿眼瞅那些喊口号的村民。这让那些村民很不舒服。¹

柳福禄的邻里纠纷主要有这几件事：

柳福禄邻居徐连友的哥哥徐连玉，出身虽是贫农，但当过土匪，也是一个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四类分子”。在批斗徐连玉时，群众揭发徐连玉不老实，曾调戏柳福禄10岁的大女儿。柳福禄非常气愤，还上去打了他。这是结下“梁子”的开始。

刘福禄的另一个邻居刘德财，与徐连友有亲戚关系。他们都是村里难缠人物。一天，刘德福的大女儿爬房顶，柳福禄怕她摔着，把她喊了下来。事后，刘德财找上门来，说柳福禄把他女儿吓病了，硬是讹了他4元多钱的药费。

红山口镇中学到和平小学开大会，把扩音器大喇叭搬到学校房上，播放大会召开的情况，有一套“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形式。徐连友嫌大喇叭声音吵闹，在家里大骂：送的什么大鸡巴，还说什么万寿无疆，是“万死无疆”。这些话被柳福禄拿着小本记下了，到军宣队告发了他，把徐连友揪去了会场。徐连友一口否认他说过这话，反过来说是柳福禄说的。当时，军宣队没工夫处理他们邻里的争吵，把他们都赶了回去。徐连友对柳福禄恨恨地说：你有小本本，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刘德财与徐连友沆瀣一气，也帮着他说话，一起给柳干仗。

此后，柳福禄与两家关系彻底断裂，再不相互串门了。刘德财还想在房前砌上堵墙，不让柳福禄走。他们邻里间不再来往。

大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马上影响到孩子的关系。这两家的孩子们和柳福禄的女儿吵架，整天地主长、地主短地骂来骂去。

1968年春节，柳福禄家买了三张毛主席像，并排贴到南炕头。里面是毛穿军衣的单人像，中间是毛泽东、林彪的双人站像，外边是毛的单人半身像。柳家贴的这三张毛像，距离炕沿两尺多，大约70公分。不曾想，柳家的麻烦就是由这些毛像引起的。

1968年4月底的一天，邻居徐连友妻子朱玉兰带着她家小四儿到柳福禄家串门，给王淑兰抓虱子。许家孩子4岁，上炕玩耍，把贴在炕中间的毛、林像从底边撕了半截。柳福禄的二女儿当时看见了，当即就喊“四小把咱的画像给撕了”。

¹ 老贫农座谈会，1970年12月27日。李成江调查证实材料，1969年10月23日。

柳福禄回家发现毛像被撕，抱怨妻子没看住，立即让她打米汤给粘上了。

过后没几天，徐家的大孩子徐德富与柳福禄的大女儿打架，乱骂说：“你们好，你们把毛主席画像的眼睛都给抠下来了。”柳福禄听了很有些紧张，但转念安慰自己，这是他们徐家的小四儿撕的像，徐家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不会有什么事情。¹

1968年6月份，学校开始搞专政（清理阶级队伍），柳福禄在建设小学听到有人揭发说，有的老师把毛主席像的眼睛给抠了。柳福禄很害怕，回家后告诉妻子，要她把炕墙上的毛主席像用报纸糊上。第二天，妻子王淑兰把已经毁坏的那张毛、林一起的画像给揭下来烧了，用报纸把炕墙上的领袖像都糊上了。

当地农村的清理阶级队伍，是由解放军和其他公社的贫下中农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进驻到各村搞运动。进驻红山口公社和平二队的贫宣队，1968年11月份进入，1969年4月撤出。

柳福禄的邻居徐连友等人向军贫宣队揭发，说地主分子柳福禄家毁坏毛主席像。这在农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军贫宣队立即派人到柳家查看。

1969年3月2日，农历正月14日，晚上，柳福禄在队里开会，妻子王淑兰和父亲柳长年在家里包饺子。邻居李仓库领着军宣队杨子春、贫宣传队吕桂珍、赵展珍和本村社员刘安五共5个人，来柳福禄家里检查。李仓库和军宣队杨子春上炕检查。他们揭开报纸，想查找那张被撕的毛、林像，但什么没有发现。柳福禄回家后，问妻子来人检查了吗？妻子告诉他，来人检查了，没有说什么。军贫宣队当场没有找到“罪证”，事后也没有重视，没有继续追究下去。

1969农历春节期间，柳福禄家又买了5张毛像。一张挂在炕的中间墙上。在墙上挂了一个木框，装上了一幅毛泽东穿军装坐椅子的像。木框下沿离炕面1米多（实际高度1.27米）。在炕头墙的地方，贴了一张毛泽东坐竹椅子的像。炕尾的地方，贴了一张毛泽东穿灰衣服的像。画像底边距离炕面都有一米多高。在门上边挂了一张毛泽东穿长衫拿雨伞的（毛泽东去安源）像，装在玻璃镜框里。在炕墙上，距离炕面5尺多高的地方，挂了一个装在玻璃镜框里的毛泽东正面像。

他们这些邻里纠纷的事情虽然不大，但是却很能反映文革时代的政治问题。邻居们依仗出身贫农的政治身份，要欺凌地主家庭身份的柳福禄。柳福禄则以他

¹ 柳福禄审讯记录，1970年2月1日；1970年2月3日。

的知识身份进行反抗，维护自己的生存权。这些邻里间的日常生活矛盾，被文革时代搞成了政治问题，打上了地主与贫农两家势不两立的阶级斗争印记，最后越演越大，成为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的一个由头。

四、柳福禄为父亲无故挨打的奔走

1969年5月份的一天，地主分子柳长年与邻居徐连友再次发生冲突。当时，农村生产队的评工分，采取的是“大寨工”的评分方式。即按照社员的政治表现、劳动表现来评定各个劳动力工分的分值。徐连友干活偷懒，出工不出力，被评为二等工，让他很不满。

这一天，柳长年和徐连友一起在水田干活时，徐破口大骂生产队长和生产组长。此时，柳、徐两家关系已经搞得很紧张，柳长年抓住这件事，报告给生产队长。

但是，柳长年到生产队长那里告徐连友状的时候，被徐的侄子徐德海听到了，告诉给了徐连友。徐连友大怒。第二天晌午，徐连友首先找了柳福禄，吵骂了一顿。然后，徐出来又到了李家，找到李仓库和李常征兄弟，对他们骂骂咧咧地讲述了事情经过，扬言要用棒子揍柳长年。这个李仓库在村子里也不是善茬。在“四清”运动时，李仓库向四清工作队告状，说生产队长朱永喜偷炖鹅肉。工作队进行调查的结果，偷鹅炖肉的事情正是李仓库自己干的，与朱队长根本没关系。

随后，李仓库来到柳长年家，说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找他，要他到大队部去。到队部，徐连友等人已经等在那里了。柳长年与李仓库首先发生了争吵，争论徐连友背后骂干部，对不对。李仓库说不过柳长年，说：“怎么着？我还管不了你呀！”柳长年回嘴说：“怎么管不了！凡是贫下中农都能管了我。”他还说：“看你为谁掌权！”柳长年说话的意思是干部应该在公正的立场上说话。李仓库急眼了，说：“你说我为谁掌权！”柳长年顶撞他说：“不知道”。徐连友给李仓库帮腔，也质问柳：“你说我是什么人？”柳说：“你自己最清楚！”这时，李常征从外面走进来，抓住他的这句话质问：“柳长年你要什么权？”柳回嘴说：“我没要权。”李常征连珠炮般地责问：“怎么的，你还要权哪！你还要权哪！”柳连连辩解说：“我没有要权，我没有要权。”李常征当年20岁，看

柳长年还敢回嘴，就动起手来，把柳长年这个50多岁的半老头子痛打了一顿。¹

柳长年去告贫农出身的徐连友，是他们邻里关系恶化的继续。他认为徐连友有个反革命分子的哥哥，在政治上也不强。柳长年显然错估了形势，他在事后的检查中说：“这个事有谁反映也没有我反映的（份）。主要是由于个人认识水平还不那么高，误认为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任何人都可以抵制。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就犯了严重错误，破坏了毛主席的大联合、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愿广大贫下中农给予严惩。”²

柳福禄听到父亲挨了打，立即跑来，找到打人的李常征评理。他说：“有事说事，有理说理，干什么打人？”李常征是柳福禄教过的学生，根本不买他的账，理直气壮地回嘴说：“柳长年是地主分子，不老实，向贫下中农反抗，我们就是要管制他。和阶级敌人有什么理可讲！”柳福禄用手指着他说：“现在什么时候啦，还打人，不是要文斗吗！”李常征胡搅蛮缠，回话说：“什么时候？现在是全国亿万军民更加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更加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将斗、批、改进行到底；现在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³这几个人一块起哄，把柳福禄给轰走了。柳走时，对在场的人说：“李常征打人，你们都看到了，大家都是当事人。”⁴

柳福禄立即找到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要他处理这起打人事件。蒋德春却指责他不对。两人发生了口角。⁵柳福禄说：“我是站在群众的立场，执行党的政策（说话），打人就是不对。”蒋德春偏袒打人者，说：“没有什么可处理的，地主分子挑动群众与干部的关系，打的就是对，他还不老实。”⁶两人发生了争吵。

当天下午，队里安排柳长年到水田地打池埂，柳的胳膊被打坏了，干不动活，来向蒋德春请假。蒋德春当面把他训斥了一顿，不准他的假。柳长年没有办法，只得忍着伤痛去干活。在路上，柳福禄追上父亲，要替他干，让父亲回家休息了。蒋德春认为这是柳福禄在包庇他的地主父亲。⁷

¹ 1969年9月13日，柳长年的检查交代材料。

² 同上。

³ 李常征1969年10月22日的调查证实材料。

⁴ 李常征1969年10月22日的调查证实材料；黑山头公社和平大队专案组：《关于柳福禄的综合材料》，1970年2月23日。

⁵ 1970年1月3日，柳福禄审问笔录。

⁶ 蒋德州的证实材料，1970年2月20日晚20时。

⁷ 蒋德春1970年2月23日的证实材料。

柳福禄找了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后，还找了群众专政组长蒋德州、二队队长朱永喜等人，都没有结果。

事发第三天，柳福禄又找到蒋德春和蒋德州，再次要求解决打人问题。蒋德州说：“你这种行为就是替你父亲翻案，你对这个问题要放明白点。你说群众是报复，这完全是错误的。这是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这时，蒋德春说：“我们的处理意见，就是打的对！”¹

柳福禄找大队干部寻求公道，碰了一鼻子灰。他很不服气，拿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给他们论理，说“毛主席号召文斗，不要武斗”，还要到公社找军宣队讨个说法。蒋德春见他要找公社，有些紧张，不准他去，强制他回生产队劳动，还警告他“不准乱告状”。²

蒋德春他们之所以要偏袒打人者，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出身硬、根子红。这些出身贫下中农的农民，仗着政治身份正，有恃无恐，在干活中偷懒磨滑，给干部闹情绪，占集体的小便宜，很是不好管理。柳长年告徐连友在干活时大骂队干部的事情，蒋德春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并不去追究这件事，而是拿柳长年告状的动机做文章，给他扣上有意挑拨群众与干部关系的政治帽子。这样做，既有要讨好这些刺头人物的成分，还有着整治“四类分子”来体现基层干部权威的意思。另外，还有蒋德春本人与柳福禄在“整党建党”中的芥蒂。

1968年10月，和平大队开始“整党建党”，要各生产小队选举贫协代表帮助整党。柳福禄是当地农村的文化人，能够讲出点道理。他给群众解释“整党建党”说：是群众整党员，不是党员整群众。在群众整党的会上，柳福禄发言说：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在场时，选票就多；不在场，选票就少。认为这种“等额选举”的办法不合适。据人揭发，柳福禄还讲过：蒋德春还想当书记呢，党员资格都不够。但据柳福禄后来讲：他当时没怎么讲话，只是附和了其他人的意见。

3

其实，不管柳福禄讲没讲话，说了些什么，是他讲的还是别人讲的，无非是表达了当地群众对这些干部的看法。他对“整党建党”运动的解释，完全符合中央文件精神。但对于正在过整党关的蒋德春他们，这些话似乎是有意挑唆群众给

¹ 蒋德州的证实材料，1970年2月20日晚20时。

² 蒋德春1969年10月23日的调查证实材料，1970年2月23日写的证实材料。

³ 柳福禄的交代材料，1969年10月24日。

他们提意见，让他们过不去。这些好发表意见的农村知识分子，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威是个天然威胁，历来是他们讨厌的家伙。这个“梁子”肯定结下了。像柳福禄这样有政治把柄可抓的地主子弟，如果还要再说些什么，那是更不能允许了。从运动的政治逻辑上说，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运动中，这些农村基层干部也都受到了冲击。在他们再度上台后，需要重新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拿这些“乱说乱动”的地富分子开刀，确实是一件很方便的阶级斗争法器。

柳福禄执意要到公社去告状，让大队革委会的基层干部们感到了紧张。在打人这件事的处理上，大队革委会显然是理亏的。柳福禄不是一般农民，而是能讲出道理来的知识分子。他当公办小学教员多年，在外面也会有些社会关系，如果让他告来告去，对大队革委会是会有些麻烦的。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柳福禄的茬子，收集他的材料，要整他的罪名。

正所谓祸不单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大队革委会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柳福禄在上课时为默写生词与一个调皮学生发生了冲突。大队革委会的这些干部，则借机要把这件小事搞成一个攻击兄弟党领袖的政治事件，顺手把柳福禄也搞成反革命分子。

五、 柳福禄在课堂“恶毒攻击”的事件

柳福禄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听从生产队安排，和社员一样下地劳动。但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地里的农活不太会干，拿不起来，干得非常辛苦，还挣不出工分来。当他看到一起下放的教师，许多人又重新回到教育岗位，而自己还在地里干农活，思想波动很大，情绪很不安。他私下给父亲讲了他的担忧：像我们这个出身，还能回学校吗？

1969年8月18日，红山口公社和平大队和平小学的负责人吕风阁，接到上级通知，要抽调他到公社整理教育革命的材料。和平小学的教师很少，吕风阁担任五年级班的教学，他走了需要有人来代课。吕风阁就找到了在生产队劳动的老同事柳福禄，要他给代一下五年级班的课，并且介绍了这个班的情况。

和平小学五年级班有12名学生，都是15、16岁的大龄学生，文化底子很差，班级纪律不好。吕风阁将五年级的语文与数学课本交给了柳福禄，要他备好课，领着学生从头复习一下语文，复习重点是字词，可简单举行一次考试。算术课是

进行解方程应用题。

柳福禄很珍惜这次回归教学岗位的机会，认真备了课。他领着这个班的学生复习了3天语文字词，第4天考试。在复习中，他发现有的学生把“叛徒”的“叛”，写成了批判的“判”；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的“恩”写成了“思”，“查”写成了“香”。他就把这些学生搞错的字词在书上标上了。划了50多个词，要学生们掌握。

语文考试安排在8月25日星期一的第二节课。随着上课的铃声，柳福禄走进五年级教室，拿着语文课本和一张写着字词的纸，给学生考试。考试共两题，第一题是听写字词，第二题是解释成语。柳福禄按照书上的字词顺序，一个词念3遍，要学生当堂默写下来。他念的第一个词是“恩维尔·霍查”，念三遍后，问同学写完了，就接着念第二个词，写大叛徒的“叛徒”两字。他念了两三遍后，学生王喜庆抓耳挠腮，写不出来这个词，反过来质问说：“柳老师，恩维尔·霍查不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领袖吗？怎么和叛徒连在一起。”

柳福禄没有想到学生会提这样的问题，赶紧解释说：“我这是按着一个词一个词，一个字一个字的听写，同学不能那样考虑。”王喜庆不依不饶。柳福禄又退让说：“这是听写字词，中间要用标点隔开。”但王喜庆还是不干，说：“这样写错了是算老师的，还是算学生的？我不写了！”柳福禄不敢再与这个学生纠缠，转而说：“我接受你的意见”，接着就让学生把这个词划掉。继续听写了“耸入云霄”、“奴仆”等词以后，再默写了“叛徒”一词。然后又做了成语解释，让学生解释了“卓越功勋”、“神采奕奕”、“如饥似渴”等词的意思。好歹算是把这堂考试完成了。¹

从事后的学生考卷看，班上同学都写了“叛徒”一词并划掉了，只有王喜庆同学没有写这个词。需要说明的是，直到后来，和平大队革委会要王喜庆同学写的调查证实材料中，他写的满篇错别字不说，其中“叛徒”的“徒”字仍然还是错的，仍然还是不会写。²

这件事情发生后，柳福禄把考试字词的纸，给点烟抽了。这或许是怕学生再找他的麻烦。对付学生，柳福禄教学多年，自然也会有些办法。他在早上“天天读”的时间，领着大家读毛泽东语录，选了接班人五条标准和组织纪律性的几条。

¹ 吕风阁 1969年9月22日、1969年10月22日、1970年1月28日的调查证实材料。

² 王喜庆 1969年10月23日给和平大队写的调查证实材料。

然后他对同学们说：“我接这个班，同学们纪律不好。有的同学认为我代几天课，就不好好学，那是不好的。大家损失大。你们快毕业了，不好好学，升中学也升不上。”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吕风阁从公社回校。在得知五年级考试的事情后，他马上分别找了五年级的同学进行了调查，详细了解了事情经过，帮着柳福禄做了几天工作。

柳福禄想让班级结合“八·二八”命令¹，开展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维持起码的教学秩序。为此，他还专门留下了3位女同学，要她们带头遵守课堂纪律，好好学习，争取升中学。有一名同学说：过去老师听写“叛徒”，前面都加刘少奇。柳福禄检讨说：“是啊，以前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²但是，大部分学生还是不听话，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会没有开成。

8月28日，吕风阁找柳福禄谈话。柳汇报了当时的情况，说：这件事发生后，怕别人说是有意的。又说，他没法给这个班的同学上课，教不了。于是，吕风阁接回了五年级的工作，将柳福禄调到二年级教学。但柳福禄在二年级只干了一个星期，在吕风阁去海龙县开会期间，他又被赶出了学校，回生产队劳动去了。³

六、大队革委会对柳福禄“恶攻”事件的处理

1969年9月12日，柳福禄离开了学校，重新回去种地去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和平大队革委会领导人处心积虑，要把这件事搞成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他们责令柳福禄立即作出深刻检查。还要柳长年写出罪行交代材料。

9月13日，柳长年写了认罪“交代书”，递交给大队革委会。

9月13日、16日、27日，柳福禄向大队革委会接连交上了三份检查材料，一次比一次上纲高。

1969年9月13日，柳福禄写了第一份检查。检查说：自己备课不认真，默写出了政治事故。大队革委会认为：太轻描淡写了。检查没有通过。

1969年9月16日，柳福禄写了第二份检查：检查说：自己在回到学校仅仅20天，就犯了错误。他的错误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背着家庭包袱，贯彻了

¹ “八·二八”命令，是中共中央1969年8月28日下发的中发〔1969〕55号文件，毛泽东批示“照办”。文件的主要意思是，制止武斗，安定社会秩序。强调要遵守纪律。

² 审讯柳福禄笔录，1970年1月30日午夜。

³ 吕风阁：《我校发生的政治事件的经过》，1969年9月22日。

封、资、修的教育路线，课堂教学粗心大意，默写生词时，把“恩维尔·霍查”和“叛徒”连在了一起，在课堂上造成极坏影响。检查还是没有通过。

1969年9月27日，柳福禄又写了第三份检查。检查说：（1）没有和地主家庭出身划清界限；（2）违反党的政策（开小片荒）等；（3）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在学校中默写的情况）；（4）自由主义（说背后说过蒋德春连一个党员资格都不够，不会劳动）；另外还有邻居徐家的孩子到他家撕毁毛主席像的事情。他请求对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¹放他一条生路。

与此同时，大队革委会开始在师生中广泛调查，多方收集柳福禄的“罪证”。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亲自把几名和平小学五年级学生找到家里，让他们写了柳福禄在课堂“放毒”事情经过的证明材料。

和平小学五年级学生崔常富、乔素芳等人写了材料，时间是9月18日。²

大队革委会找到柳福禄在建设小学教过的学生，要他们证明柳福禄在建设小学教学时，烧毛主席语录、打骂贫下中农子弟。学生王青生、包乘进、韩长和等人写了材料，时间是1969年9月22日。³

大队革委会找了动手打柳长年的当事人李常征，要他提供证明说：柳福禄对打他父亲不服气，当场对贫下中农示威。

9月22日，和平小学负责人吕风阁给大队革委会写了关于柳福禄上课情况的证明材料，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根据和平大队革委会的布置，和平小学的教师专门开了两次斗争会，对柳福禄进行揭发批判。揭发批判的内容有三条：一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好，不请假办私事，劳动挑轻躲重；二是看到别的教师接受再教育后都回校了，对没让他回校表示不满；三是借砍柴之机把小树棵给砍了，生产队罚他款，他始终没交。⁴这三条所讲的事情，都与学校工作无关，很明显，这完全是按照大队革委会交代的口径讲的。

1969年10月16日，和平大队革委会做出《关于柳福禄问题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给柳福禄罗列了一大堆罪状：

1. 该人出身地主分子家庭，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¹ 有原件。

² 有原件。和平大队公章日期1969年10月23日。

³ 有原件，建设大队公章日期1969年10月22日。

⁴ 吕风阁1970年1月28日的调查证实材料。

仇视广大贫下中农，在教学期间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体罚、打骂贫下中农子女；

2. 大搞反（翻）案妖风，公开支持其父地主分子柳长年反（翻）土改的案；

3.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撕毁毛主席画像，用主席语录升（生）炉子；

4. 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密战友阿尔巴尼亚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

5. 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期间经常不参加劳动，以割柴火为名进行乱砍盗伐；

6. 破坏整建党运动，在群众中散布说×××（注：指大队书记蒋德春）党员不够，有问题，现在表现很不好。

经大队党支部和大队革命委员会研究，根据本人表现，同意给予该人清除教育界，戴帽管制生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¹

但是，大队革委会感到，要把柳福禄的这些罪状坐实，先前收集的材料分量不够，于是又赶紧找当事人，紧急补充了材料。还责令柳福禄写出一份更完整的检查材料。

1969年10月22日，和平小学教师吕风阁、学生梁素芬、朱桂花、官桂琴、柏永刚、崔常富、王喜庆又提供了新写的调查证实材料。王喜庆就是在课堂上当场给老师柳福禄发难的学生。在这份材料上，他的叛徒的“叛”字，还是不会写。打人者李常征再次提供了调查证实材料。在这份调查材料上，代笔人为了强调李常征的政治身份，写的是：贫农，党员，红旗煤矿工人（在其他材料上，李常征的身份是：贫农，团员，社员）。

为了加重材料的分量，调查材料还增加了两个年纪大的人的证明材料。一个是63岁的贫农王双喜，证明柳福禄砍柴时割了小松树的材料；另一个是50岁的李成江，证明柳福禄替地主父亲翻案的材料。

10月24日，柳福禄再次写了检查材料交上。这份检查共写了7页纸，是最长的一份。

和平大队革委会将这些证明材料盖上公章，连同柳福禄的检查材料，与大队的处理意见一并送到公社。请公社革委会审批。

¹ 红山口公社和平大队革命委员会《关于柳福禄的问题处理意见》，1969年10月16日。

1969年10月25日，海龙县红山口人民公社革委会做出了对柳福禄的处理意见：“柳福禄确系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子弟，已不适应做教育工作。清除教育队伍，下放农村参加集体劳动，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以继续观察。”¹

起先，大队革委会还想把这个事情搞成一个“现行反革命”案件，逮捕柳福禄，送交公安机关处理。但公社把柳福禄的材料报到县里以后，经海龙县革委会人民保卫部审查，认为该案件的事实部分不清，没有批准。²

按说，这个事情到此应该结束了。但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和平大队革委会又“发动群众”，根据邻居两个小孩子的“揭发”，搞出了一个柳福禄在家里针扎毛主席像的“反革命事件”。旧账加新债，柳福禄这次是在劫难逃了。

七、追查柳福禄“毁坏”毛主席像

1970年初，全国掀起了“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海龙县立即行动起来，做出运动部署。县机关、公社、大队都建立了专案组。“一打三反”运动的首要目标是打击现行反革命。柳福禄的案子再度被提起，又加上了故意毁坏毛主席像的问题，升级为现行反革命案。于是，海龙县革委会人民保卫部直接插手这个案件的侦查和审理。

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是取代公、检、法三家的专政机关，内设秘书、治保、政保、战备办、审判5个组，各组组长均由军代表出任，副组长由地方干部出任。³

1970年1月3日，海龙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派来一个姓张的军人，到红山口公社和平大队调查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件。

1970年1月3日，上午9时，在和平小学召开了教师批斗会，对柳福禄进行揭发批斗。批斗后，上午10时10分，县人保部办案人张某对柳福禄进行了初步审讯，内容比较简单，就是交代给地主老子翻案的目的和动机。这是先接触一下“案犯”。

¹ 见原件。

² 海龙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政保组：《对柳福禄反革命案件调查报告》，1970年4月21日。

³ 《梅河口市志》，第179、196、197、215页。

在大队革委会协助下，县人保部办案人员张某成立了7人参加的专案组。成员老中青结合，年纪大的大队支委耿德福56岁、年轻的党员蒋德州28岁。当日，专案组商定，采取“小会煮，大会揭批的方法”，对柳福禄进行突击审查。以毁坏毛主席像的事为侦查重点，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重新收集证人证词。从1月底到2月初，专案组收集了10多人的调查证明材料。让教师吕风阁，学生王喜庆、刘晶月等人提供了柳福禄在课堂上“攻击”恩维尔·霍查的材料；让刘德财、李仓库等提供了柳福禄为地主老子翻案的材料；让邻居朱玉兰，邻家孩子刘宪江、徐德富等，提供了柳福禄家毁坏毛泽东像的材料……。

二是对柳福禄进行连续突击审讯。从1970年1月29日开始，专案组对柳福禄进行了一场车轮战的审讯。

1月29日凌晨5时20分，专案组对柳福禄进行了第一次审讯。追查听写、翻案、撕毛像的问题。

1月30日上午10时53分，进行第二次审讯。追查柳在学校烧语录、在生产队接受“再教育”问题。

当日晚上23时20分至午夜2时22分，进行第三次审讯。追查柳的听写、撕毛像的问题。

1月31日上午7时，进行第四次审讯。继续追查他的听写、撕毛像问题。

2月1日早上5时53分至7时33分，对柳进行第五次审讯。追查柳家撕毛像的事情。

2月2日晨4时20分，进行第六次审讯。追查柳的试图改变家庭成分、撕毛像的事。审讯完对柳福禄进行群众批斗。

1970年2月3日上午11时，进行第七次审讯。追查烧语录、撕毛像、翻案等，还提出了用针扎毛像的新问题。¹经过几天车轮战的连番审讯，柳福禄已经完全崩溃了，此时让他承认什么他都会承认的。

1970年1月30日是农历腊月23日，离北方的小年还有一个星期，农村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置办年货。大队专案组到柳长年家，让柳出去，对他家进行了搜查。他们在柳家后院发现了一个坑，认为有蹊跷，遂把柳长年叫去大队部问

¹ 海龙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讯问柳福禄笔录，1970年1月29日到2月3日。

话。柳回答说：这是1964年为泡梢条子挖的。梢条是农村编织筐篓的材料，需要泡软了才能编。

柳福禄此时又新扯出来了一个最要命的事情：针扎毛主席像的问题。是刘德财的三儿子刘宪江、徐连友的儿子徐德富揭发的。这两人都是村里最有名的捣蛋鬼，手脚不干净。他们因为偷东西，被学校批评了，此后不再上学了，就在村子里游荡，见什么偷什么。村民说他们是“无宝不落”，很讨厌他们。¹他们俩向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报告，柳福禄毁坏毛主席像，用针扎了毛泽东的眼睛。这件事成为了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的一个重要证据。

1970年2月1日，和平大队革委会专案组组织民兵、红卫兵对柳福禄家进行了详细搜查。进门后，他们先把父亲柳长年赶走，然后各处检查，然后把柳家的毛主席像都拿走了。事后，专案组写了《现场检查报告》。

《现场检查报告》称：“柳家南炕炕头距炕面有一米三十左右，贴有一张主席坐竹椅画像，左眼被刺，左手刺在中指关节，右手刺在食指关节，在嘴的上部，鼻子尖下部中间被刺之现象；在距离地面有六尺半左右的梁托上相框之内主席坐沙发的画像，眼珠被针刺破；而后又从书箱内查出一张六八年元旦社论所登载主席大幅画像，眼睛有被针挑的痕迹；在门框上面，距地面六尺半以上挂有一张开国大典的画像，（主席）头部有用刀划乱之现象；南炕，炕稍距地面有一尺左右，挂有一张（主席）围围脖的画像，发现用泥色拦腰切断迹象等七张画像。”其中，主席坐竹椅、沙发的画像缺损，元旦社论报纸的画像缺损，都是人为“有意所做”。“大人作案面大”。²

1970年2月2日，和平大队批斗柳福禄。专案组给柳讲，他们家的毛主席像被人扎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柳大惊失色。

柳福禄没有吃早饭，抽空匆匆跑回家来。妻子王淑兰正在做饭。柳福禄问妻子：他爷爷（指柳长年）呢？妻子说：上街了。柳福禄说：等他爷爷上街回来，告诉他，让他承认把毛主席坐竹椅子那张像的眼睛和嘴给扎了。我在家领你们过日子。妻子问他扎哪里了。他说：嘴是扎的上嘴唇，眼睛没有说。还说：书箱报纸上的主席像眼睛也给扎了，让他爷爷承认。王淑兰问：你怎么知道的？柳反问说：你看见谁扎的没？妻说没看着，问他看见谁扎的。柳说：他也没有看见，是

¹ 老贫农座谈会，1970年12月27日。

² 和平大队革委会专案组：《现场检查报告》，1970年2月1日。

有人给他说的。柳给妻子说，扎到毛像的眼睛了，但具体扎到什么地方，他并没有说。¹

其实，柳福禄完全不知道他们家的毛像被扎的事情，都是听专案组说的，根本就说不清楚所扎部位。此后，柳福禄就被专案组隔离起来了，不让回家，让家里送饭。但是，这就给他们“串供”带来了问题，这让“老地主”柳长年该如何给他分担起这个罪责呢？

1970年2月4日是（农历）腊月28日，上午9时35分，专案组找柳福禄妻子王淑兰，询问毛像被扎的事情。柳长年给生产队请假上街，回来时天已黑了。回家一进门，儿媳王淑兰就给他说明：你儿子偷偷跑回来了，要你承认是你扎的毛主席像。柳长年与儿媳素来不和，一听火了，说：“你自己怎么不承认，这不是往棺材里送我呀！”

王淑兰脑袋耷拉下来，掉泪哭了。她边哭边说：你承认了，柳福禄的罪能轻点，好能在家过日子。柳长年坐在炕沿上也哭了。他边哭边想，想明白了儿子媳妇的道理。反正自己是一个人，到哪里都是干活吃饭，死了拉倒。他们是一家人，还得一起过日子啊。于是，他就给王说：叫我怎么承认，你说吧。王说：柳福禄让你承认，他如回来领着我们过日子。柳长年说：我愿意去，但我可没有做这个事，是哪一张？王指着梁下的毛坐椅子的那张，说：这张扎在嘴牙上，胳膊上，大腿上。还有书籍的那张报纸，也把眼睛给扎了。柳长年问：扎在左眼了？右眼了？王淑兰让他问恼火了，说：“看你问得个详细！”柳长年说：“详细？你不说清楚，到时间比这个问得还详细呢。”“你叫我承认，我咋承认啊！”

晚上，柳长年睡不着，反来复去想，决心替儿子顶罪坐监，自己给自己扣帽子，给自己加罪。又想，不是自己做的事，说不准怎么办。最后他想出一个应对办法，如果上边问，就回答说，我急眼了，扎的哪里记不清了。第二天，柳长年去给儿媳王淑兰说，他寻思过来了，他去替儿子顶这个罪，可是他说不出针扎在什么地方啊？王告诉他讲：这三针是两边的嘴牙，下巴。柳一听，昨天是那三针，今天又是这三针。讲三次都不一样啊！如果和事实不符合，敢给专案组这么说吗？这不是罪上加罪吗？他越想越害怕，不敢承认了。²

1970年2月5日，农历腊月29日，柳福禄突然回家来了。这让柳长年很是

¹ 同上。王淑兰讯问记录，1970年12月26日9时至14时。

² 县人保部：柳长年讯问笔录，1970年12月1日上午10点。

意外，赶忙问儿子怎么回来了？柳福禄说：领导让我回来过个年。柳长年心里一阵酸楚，眼窝一热，怕被儿子看见，赶紧把脸转到北炕，落下眼泪。

过了一会儿，柳福禄把父亲叫到他屋的南炕上坐。柳长年问儿子，到底你把主席像扎哪里了？他好去替儿子定罪。但是，柳福禄根本不知道扎在哪里了，说不出来，已经死了让父亲定罪的心思，决心自己认了这个账。他对父亲说：“算了，别问了。这不是替的事。我最担心的是你们不和的事，以后和王淑兰好好过。我过了年就能回来。”他专门叮嘱父亲，他妻子王淑兰脾气不好，让父亲担待她点。柳长年满口应承下来：“能担待，能担待，我一定得像个老的样。”这时，有人来说，有电话找柳福禄。柳福禄就走了。

柳长年随后也上街去打油，准备过年。突然，背后有人喊爹，柳长年回头一看，柳福禄背着铺盖行李，两个背枪民兵押着。他一看要把儿子送去县吃官司了，就给儿子说，到那里好好认罪。事实上，柳长年也说不出儿子该认什么罪来。他给队长请假，想去送送儿子。

柳长年回到家里时，儿媳妇和孩子哭成一片。他赶紧含泪劝慰说：别哭，别哭。党的政策是宽大呢，交代好了，就能宽大处理，……。¹

八、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的侦查审理

1970年2月5日，柳福禄被带到海龙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关押在“红卫连学习班”（即“群众专政劳改队”）里，由专政机关正式审理他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审问是分头进行的。一头是县人保部对柳福禄的审讯；一头是在和平大队对柳福禄父亲和妻子的审问。目的是与柳福禄的审讯材料对证。

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审理归县人保部政保组。柳福禄被带来后，县政保组从1970年2月15日到18日，连续审问柳福禄5次。每次审问时间都在2小时以上。县政保组还要求柳福禄写出书面交代材料。2月3日、2月10日、2月18日和2月20日，柳福禄连续写了4份交代材料。

柳福禄在这些交代材料中，给自己的事情无限上纲，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大帽子。如：柳福禄在1970年2月10日的检查材料中说：他在给学生考试时，把

¹ 县人保部：柳长年讯问笔录，1970年12月1日上午10点；柳长年讯问笔录1970年2月21日。

“恩维尔·霍查”和“叛徒”连起来，是“配合国际上的苏修叛徒集团们，大肆向社会主义阵营攻击，恶毒的污蔑诽谤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一盏明灯”，……“企图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在2月18日的检查材料中，柳福禄全盘承认了那些强加于他的所有罪名：给学生听写是有意放毒，替地主父亲翻案是阶级本性，扎毛主席像是泄愤等等。¹

在县人保部审讯柳福禄的同时，在和平大队，专案组也紧锣密鼓地对柳福禄的家属进行了连续审讯，以便落实柳福禄的罪证。

1970年2月20日，专案组在和平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家里，两次审讯王淑兰，查问扎毛主席像的事情，有没有与柳福禄串供。第二天，专案组在蒋德春家又接着两次审讯王淑兰，继续追查扎毛主席像的事情。最后，王淑兰承认了是柳福禄扎的毛像，她还与柳福禄有过3次串供。²

1970年2月21日下午和晚上，专案组连续两次审问了柳长年。柳长年在交代中还想给儿子撇清“翻案”的责任。他讲：在“四清”时曾给儿子讲过改出身成分的事情，当时儿子的态度是不同意，说“你都承认了，我还能替你翻案吗？就这样组织上还说我包庇你呢。”³

在收罗了相关材料后，和平大队革委会认为差不多了，于1970年2月23日给公社上报了处理柳福禄的意见材料，提供给县人保部，作为审理柳福禄案件的判决根据。

这批大队革委会精心组织的材料，代表性很全面，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对柳福禄的处理意见：有柳福禄所在生产队的处理意见（和平二队代表最基层单位）；有临近生产队的处理意见（和平四队代表群众意见）；有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处理意见（代表教育口）；和平大队专案组的处理意见（代表政法口）；最权威的是和平大队党支部、革命委员会的处理意见（代表一级党政组织）。这些材料语气非常严厉：不把柳福禄判刑，革命群众绝不答应。

和平大队专案组的《柳福禄综合材料》中列举的柳福禄罪状是：（1）顽固地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替其反动家庭及其地主分子父亲柳长年大搞翻案妖风；（2）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兄弟国家领导人（恩维尔·霍

¹ 柳福禄检查材料，1970年2月10日；柳福禄检查材料，1970年2月18日。

² 王淑兰讯问笔录，1970年2月20日；王淑兰讯问笔录，1970年2月21日。

查)；(3)攻击诽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各项政策，乱砍盗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更为阴险地是，刘犯在群众批斗期间曾三次与妻(王淑兰)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脱罪责，驾(嫁)祸于人。后在证据面前，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不得不低头认罪，交待自己的罪恶事实。”¹

和平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意见说：柳福禄利用在和平小学代课之机，利用合法讲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意给刘犯从严处理，依法惩办。²

和平大队第四生产队的意见是以全体贫下中农，政治队长王长生、队长王守仁、治保委员季瀛洲的名义提出的，列举了柳福禄多次为成分翻案、认罪态度不好等五条罪状。第二条是“攻击恩维尔·霍查”，讲柳福禄利用合法讲台，进行反动活动，配合帝、修、反的侵华准备工作，污蔑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领袖，……也就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这个生产队的处理意见是：“根据上述事实，理应从严处理，以致法办。”³

和平大队二队关于柳福禄的处理意见说：柳福禄出身反动的地主家庭，品质恶劣，极端反动。(1)公开替他反动老子翻案；(2)更恶毒的是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3)利用自己在教育界里的职权，公开做反标案件，情节严重，没有老实坦白交代自己的反动事实……。最后说：根据党给出路的政策，给柳福禄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交群众管制劳动，“如果以后还没有悔改之心，就从严处理，立即判刑。”⁴

海龙县和平大队党支部、革委会的处理意见，列举了柳福禄的罪状：“利用无产阶级的合法讲台，漫骂攻击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霍查同志，借以影射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配合苏修反华，妄图颠覆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事后，柳又狡猾抵赖，多次与其妻订立攻守同盟。”最后，大队的处理意见是：“柳福禄实属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犯罪分子，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我们强烈要求专政机关，以(依)法捕办，严惩犯罪分子柳福禄。”⁵ 值得注意的是，和平大队的这份材料除了盖了“红山口人民公社和平大队革命委员

¹ 《和平大队专案组关于柳福禄罪状的综合材料》，1970年2月23日。

² 《和平大队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柳福禄处理意见》，1970年2月23日。

³ 《和平大队四队关于柳福禄问题的处理意见》，1970年2月23日。

⁴ 《和平二队革命领导小组对于柳福禄的处理意见》，1970年2月23日。

⁵ 《和平大队党支部、革命委员会对柳福禄的处理意见》，1970年2月23日。

会”的公章外，还盖上了革委会主任蒋德春的私章。可见蒋的重视程度。

在这些对柳福禄的处理意见中，最轻的是和平二队的意见，在队里管制劳动；最有分量的是和平大队的意见，反革命犯罪分子，逮捕法办。

1970年三四月，“一打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当地对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的侦查工作，也紧锣密鼓地抓紧进行。

1970年3月，县人保部政保组连续审问柳福禄6次，讯问柳长年2次，讯问王淑兰2次。政保组把柳福禄带到红山口公社中学，连续审讯逼供。为了让他老实交代，还把他带回大队进行批斗。但是，柳福禄的事情，再上纲上线，也就这么多。他实在再交代不出还有什么东西了。

在这一轮审讯时，柳福禄推翻了过去在专案组逼供信下讲的话，否认了他有意去毁坏毛主席像的事情。但政保组审讯人员认为，这是反动、狡猾、畏罪的翻供抵赖，不予采信。

政保组还又收集了柳福禄乡亲邻居们的证言。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柳福禄与徐连友两家是死对头，关系很不好。他们本来是一个院东西屋的邻居，原来关系很好，后来因为孩子问题、房子问题、告状问题、打人问题，两家闹了别扭。徐家孩子和柳家孩子经常打架，骂他们是地主的儿子，还不老实听话……。

1

徐连友正是向大队革委会告发柳福禄毁坏毛像的人，毁坏毛像是他儿子亲眼看见的，就是说这是孤证，没有旁证。他们挟嫌报复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政保组还是照着“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审查逻辑走了下去。

经过多方收集材料罪证，专案组整理了一份完整的柳福禄反革命案件的综合材料，列举了刘的四大罪状：

1.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兄弟国家领导人。罪证有3条。（1）用毛主席语录生炉子，在家里把毛画像的眼睛给抠掉了；（2）让学生听写“恩维尔·霍查”“叛徒”；（3）批评学生“小泥鳅翻不起大浪来”。

2. 大搞翻案妖风，支持其父公开向贫下中农要权，梦想夺回已失去的天堂。罪证2条。（1）四清时想改成分，为地主搞翻案；（2）为父亲被打的事情到处告状。

¹ 李成江证实材料，1970年4月17日；蒋德州证实材料，1970年4月17日。

3. 蒙蔽一部分群众，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攻击革委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为资本主义大开绿灯。罪证有4条。（1）拉拢一些人，“把广大革命群众长期的对立起来，相互打内战”。（2）散布某某（按：指蒋德春）不够党员（标准），破坏整党建党。（3）开小片荒，扩大自留地。（4）以砍柴为名进行乱砍盗伐，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

4. 破坏教育革命，仇视贫下中农子弟，利用合法讲台，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体罚打骂贫下中农子女。

5. 现在表现。根本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¹

1970年4月17日，海龙县红山口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改变了1969年10月25日做出的将柳福禄清除教育队伍的处理决定，做出《关于柳福禄反革命案件的处理意见》，把柳福禄定性为“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要求公安部门“逮捕法办”²。

1970年4月21日，海龙县人民保卫部政保组做出了《对柳福禄反革命案件调查报告》，报送人保部审批组审查批准。

政保组调查报告说：罪犯柳福禄，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对党的各项政策心怀敌意，为其父反动地主分子喊冤叫屈；从1968年来用手扣（抠）、针刺手段污辱毛主席画像；在代课考试时公开让学生书写“恩维尔·霍查叛徒”，借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事后又盗用批判无政府主义之名，行镇压学生革命行动之实。

报告说：罪犯柳福禄“实属反动透顶、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罪。”为此“经过政保组讨论，一致认为必须逮捕严办。”

3

九、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的复查和平反

海龙县人保部政保组对柳福禄反革命案件的侦查报告，可以作为一篇气势汹汹的大批判文章，但从法律文件的证据角度看，则是漏洞很大，错误明显。首先，该文件是从臆想的作案动机上揣测当事人的“罪行”。第二，该文件大量使用“极为不满”、“怀恨在心”、“赤膊上阵”、“反动思想大暴露”、“贼心不死”

¹ 柳福禄综合材料，该件无日期，从材料内容上判断应是1970年4月。

² 红山口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关于柳福禄反革命案件的处理意见》，1970年4月17日。

³ 海龙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政保组：《对柳福禄反革命案件调查报告》，1970年4月21日。

等等虚饰之词，但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第三，该文件关于犯罪动机所列举的一些证据，都是来自当事人的口供中自述的心理动机，而且这些口供已在审理过程中为当事人所推翻，是不能再作为定罪依据的。总之，这是一份事实不清、证据不明的法律文件。

在政保组《对柳福禄反革命案件调查报告》上报之后，县人保部的审批部门很快发现了此案的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疑点很多，不能成立。于是，人保部重新派出有经验的办案人员张连和、尹希江等人，对柳福禄案进行复查。

1970年5月底，县人保部将柳福禄释放回家。从1970年2月5日到5月，柳福禄被无辜拘留了105天。

1970年11月30日，县人保部复查办案人首先找到当事人柳福禄，在和平二队小学教室对他进行了讯问，从10时多一直谈到16时45分。¹

随后，当天下午17时至19时，县人保部复查人员又立即在和平二队队部讯问了王淑兰。王淑兰讲：她根本不知道针扎毛主席像的事情。否认了过去她讲的看到柳福禄扎毛主席像的事情，说这是他们逼着说的。²

当晚，复查人员又连续找了耿德财、蒋德州等人谈话，进一步核实情况。

第二天上午，县人保部复查人员把地主分子柳长年找到和平二队场院审问，追查针扎毛主席像的事情。柳长年坚持原说：不知道谁扎的。³

1970年12月1日当天，复查人员找来了最先报案说柳福禄家主席像被扎的几位，邻居家孩子徐德富、刘宪江、刘宪江的爹刘德财等。让他们重新叙述了发现和报案的情况。

复查办案人还召开了和平二队座谈会，参加的有二队队长朱永喜、社员白禄亮、政治队长王宪成、贫协组长姜长生，让大家讲一下柳福禄回乡劳动的表现情况。⁴

1970年12月2日，红山口公社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调阅了柳长年的档案。

经过这一轮调查，县人保部复查人员已经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无厘头的假案。但即使是假案，推翻也是需要证据的，而且还需要更扎实的证据。所以，在12月下旬，复查办案人又对案件涉及的证人进行了全面调查，逐个地敲实证据。

¹ 柳福禄讯问笔录，1970年11月30日。

² 王淑兰讯问笔录，1970年11月30日。

³ 柳长年讯问笔录，1970年12月1日。

⁴ 和平二队座谈会，1970年12月1日

在前一轮调查中，关于在课堂考试时听写“恩维尔·霍查，叛徒”的事情，事实已经清楚了。但关于毁坏毛主席像的事情，当事人说法不一，各说各的，对不起头来，事实搞不清楚。这次，人保部复查办案人重点调查柳福禄毁坏毛主席像的事情。

为了核实刘家毁坏毛像的事情，复查办案人从不同方面入手调查，主要找了三方面人员。

一是参加搜查柳福禄家的邻居。

复查办案人分别找了李仓库、刘德财、刘安五等人。这几个人都住在和平二队，与柳福禄是邻居，当年都参加了搜查柳家的事情。刘德财、李仓库与柳福禄素来不和，是告发柳福禄的主要人物。

二是参与处理这件事的贫宣队人员。

复查办案人分别找到当年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赵典珍、吕桂珍、袁长贵等人，了解1968年底柳福禄家损坏毛主席像的情况。这些人都是外村人，接到报告后，都到柳福禄家去检查过，当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事后也没有采取措施。¹这说明这件事本身就是空穴来风。

当时任红山口小学专政组长周国才，宝山小学负责人，以及其他当事人孔祥民等也写了证明。他们都没有在柳福禄家发现针刺毛主席像的事。²

三是公社方面参与处理这件事的知情人。

为了搞清楚案件调查的办案过程，复查办案人还找了当时在红山口公社群众专政指挥部专案组工作的黄境安，在红山口公社斗批改办公室工作的于振华。黄讲了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和平大队报告柳福禄现行反革命嫌疑的事情，及其调查经过。³于则讲了他从1969年12月27日至1970年2月20日，参加处理柳福禄案的情况。

从他们讲述的情况看，这个案件明显有挟嫌报复、落井下石和逼供信的问题。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在这个案件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970年12月25日，复查办案人张连和、尹希江，带着现场检查人刘安五、李仓库、赵典珍等人，到柳福禄家，进行现场复核。事后，他们写了现场复核情

¹ 赵典珍调查证实材料，1970年12月23日；李桂珍调查证实材料，1970年12月22日；袁会长调查证实，1970年12月25日。

² 周国才调查证实材料，1970年12月23日。贫农，

³ 黄静安调查证实材料，1970年12月23日；俞震华调查证实材料。1970年12月24日。

况报告。¹

为了搞清柳福禄在学校的工作情况和政治表现，复查办案人找了刘的同事和生产队的老人，通过个别交谈和召开座谈会的方式，了解他的情况。

复查办案人找了柳福禄工作过的同心小学、建设小学的同事们。同事们如实讲了柳福禄的工作情况，对他的了解。大家都评价说，刘是个本分人，服从领导，工作态度认真。²

为了搞清柳福禄在生产队劳动和邻里关系的情况，复查办案人在村里召集了几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都是与双方没有利害关系的，成分又好的老成农民。

1970年12月27日，复查办案人张连和、尹希江召集老贫农座谈会，了解以下情况：（1）柳福禄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情况。（2）对家庭成分有否不满。

（3）柳福禄、徐连友两家的关系。与会者姜长生、王双喜、张洪发、赵庆信、朱文友，都是村里有威信的老成人。他们如实地讲了柳福禄与邻居徐连友、刘德财发生的矛盾冲突，对徐连友、刘德财的人品评价很差，说他们都是不好好干活，惹是生非的家伙。他们的儿子刘宪江、徐德富（告发柳福禄一家毁坏毛像的两人），都是村里偷摸成性的坏孩子。整柳福禄的这几家都有些沾亲带故的亲戚关系。³

复查办案人还召集大队治保主任张宗喜（党员）、民办教师蒋德州（党员）、贫农社员蒋德海、赵长智等人开座谈会，专门了解柳福禄与邻居徐连友、刘德财的冲突问题。⁴

经过这些外围调查的工作，复查办案人在对事情的由来和经过已经基本掌握之后，开始直接询问当事人。

1970年12月25日下午，复查办案人找柳福禄大女儿调查。柳的大女儿13岁，上小学三年级。她说：只听说过他父亲在小学出了点事，不知道有撕毁毛主席像的事情。⁵

1970年12月26日上午，复查办案人找柳福禄妻子王淑兰调查，询问她家毛像被扎的事情。王淑兰讲，她当时把毁坏的毛像取下，打了米汤用报纸把中间空出的墙糊上了。柳福禄让他把没有损坏的里外两边的毛像也都给糊上了。并没有

¹ 有原件。

² 李树枫证明柳福禄在同心小学工作情况，1970年12月26日；建设小学关于柳福禄日常表现座谈会，1970年12月26日。

³ 老贫农座谈会，1970年12月27日。

⁴ 有原件（无日期，判断是在1970年12月下旬）。

⁵ 柳敏丽讯问笔录，1970年12月25日。

扎毛像的事情。¹

1970年12月26日下午，复查办案人又找柳福禄调查。柳福禄再次讲述了“翻案”的问题、课堂考试的问题、毁坏毛像的事情，否认他用针扎毛像。

在原告方，复查办案人讯问了邻居许连玉的妻子朱玉兰、儿子徐新军。²还要找徐连玉和刘德财再做调查。刘德财、徐连友见这次县里来的人翻来覆去调查毁毛像的事情，很紧张，不愿意再出面作证，想躲掉。³他们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革委会主任蒋德春当枪使了。

1970年12月26日，复查办案人找了刘德财、蒋德州，核实了有关情况。

1970年12月27日，复查办案人直接找到告发柳福禄毁坏毛主席像的两个孩子，刘德财的儿子刘宪江，徐连玉的儿子徐德富。办案人员要他们说实话，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在办案人员的讯问下，他们承认在村里偷东西，数落了自己干了16件坏事。对于柳家毁毛像的事情，刘宪江、徐德富讲得颠三倒四，前后矛盾，一会儿讲一个样，不能自圆其说。在办案人员的一再追问下，他们实际上都承认撒了谎，扎毛像根本是他们编造的事。⁴

至此，柳福禄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可以说是真相大白了。这完全是栽赃诬陷，罗织罪名，无中生有的一个政治假案。

1971年8月7日，海龙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对柳福禄案子做出批复。⁵

批复通知全文如下：

红山口公社革命委员会：柳福禄一案，经研究决定：听写中的问题系无意中造成的政治错误。柳福禄家中主席像被扎属实。系何人所为，证据不足，目前无法查清，可挂事不挂人。

吉林省海龙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章）

一九七一年八月七日

¹ 1970年12月26日9时至14时，王淑兰讯问记录。

² 朱玉兰讯问笔录，1970年12月26日15时40分至16时20分。

³ 蒋德州证实材料，1970年12月28日。

⁴ 刘宪江讯问笔录，1970年12月27日，9时10分至13时25分；徐德富讯问笔录，1970年12月27日。15时25分至16时55分。

⁵ 海龙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对柳福禄案子的批复，批复通知（71）海保批字第20号。1971年8月7日。

这份文件的最为蹊跷处是柳家的毛像“被扎属实”一句。从上述情况可知，办案人员明明是已经查实了，柳福禄家中毛像并没有人为损坏。但为什么这份司法文件还是说“被扎属实”呢？既然“被扎属实”，又搞不清“系何人所为”，这完全是“糊涂官判糊涂案”了。其实，这里的难言之隐，就在和平大队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蒋德春那里。各条线索追到最后，都到了他这里。但他这时已经是农村基层大队重新上台的“当权派”了，案件至此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落实政策”的名义下，文革中的许多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柳福禄也看到了自己平反昭雪的希望。

1978年9月4日，柳福禄给中共海龙县委、县教育局党组写信，申述自己在文革中无端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关押的冤情。

在申述信中，柳福禄不无悲愤地说道：“1968年11月份，我被所谓的回到生产队‘接受再教育’，他们教育我的结果是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信中谴责有人给他制造的这起“现行反革命”假案，再次申明他家挂的毛像位置，不可能人为毁坏。柳福禄说：县保卫部一个姓张的审案人，说从我家搜去的画像上有被针刺的痕迹。“再愚蠢的反革命也绝不会把毛主席的画像张贴在自己家中作案”。这是很有说服力的反驳。

1979年2月17日，海龙县公安局做出《对柳福禄平反的决定》（海公政字第4号）。决定说：

经复查认为，柳福禄家中主席像被毁坏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是刘所为，在课堂上写字所造成的问题，性质亦不明显，所以收容教育是不当的。本着“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经海龙县公安局决定撤销原结论，予以平反，政治上恢复名誉，建议原单位补发收容期间工资。销毁原材料。

海龙县公安局（章）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

柳福禄在文革中的这个无妄之灾的“罪案”解决，尽管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总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

后记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吉林省海龙县在1970年共发现各类政治案件58起。其中，反动标语案53起，反动口号案2起，污辱领袖画像案1起，匿名信案1起，反革命凶杀案1起。¹我们现在已无从知道柳福禄反革命案具体归为哪一类案件，是反动标语案？还是污辱领袖画像案？但是，这类事情在文革中无疑都是非常严重的反革命案件。在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非常普遍。从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到中小学的学生，经常会要求写字对笔迹，查所谓“反标”，许多人对此都有印象。全国因为对毛泽东、林彪有不恭言行而判罪的人，成千上万，不胜枚举。这种情况完全超出了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范畴，而是在全社会制造红色恐怖的氛围。当“三忠于、四无限”把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到极端时，也正是此类案件频发的最高峰。柳福禄反革命案件是千百万同类案件中的一个普通案例，具有文革此类“司法”案件的共性。

相对于文革高层政治的波谲云诡，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案件，一个农村小学教师的不白之冤，本身的分量是微乎其微的。在国家政治的车轮滚动下，这些普通人蝼蚁般的命运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这类底层社会发生的微观政治事件，往往会被人们忽视掉。然而，在这些微观政治事件中所包含的多层次历史维度，可能并不比那些高层政治的大事件少，甚至还要更丰富些。因为这些底层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往往要比高层的物理性权力结构更具稳定性。因而，无论是从生物生态还是政治生态来说，底层社会反映出的问题可能更具根本性，从而也更具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和普遍性。所谓一粒米藏大千世界，一滴水见汪洋大海，能够以见微知著的敏锐去发现历史、观察社会，对于我们洞悉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事实上，当前在文革研究中，涉及高层政治和高层人物的事情，最能吸引人们的目光，但此类事情中的虚假东西也最多。这里可以看出猎奇和传播的互动关系。只要有关高层政治的事件人物，哪怕是荒诞不经的谣言，也会经久不息地流传。甚至还有人故意在历史问题上弄虚作假，打着恢复历史真相的名义制造伪史。当前林彪事件的研究就是这样的例子。几个文理不通的写手，编造一些离奇古怪的“爆料”故事唬人，欺骗海外那些不熟悉中国文革的人，把严肃的历史变成了

¹ 吉林省海龙县公安局：《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一各类政治案件侦破情况表》，1972年1月。

阴谋论的传奇。其实，这些故事编造得并不高明，漏洞百出，只要具备学术常识，并不难辨别真伪。相比高层研究而言，底层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百姓生活史的研究，揭示的是历史活动的常情常理，可能是更见学术功底的事情。

由于文革高层政治研究的封闭性，许多史料缺失，一些高层人物的亲属子女著史成风。但这种历史写作，弊端很大。一是亲属子女并非当事人，所知有限；二是有特定的价值立场，影响客观性，会把共和国历史变成皇亲国戚的历史，陷入“本纪”、“世家”、“列传”甚至“演义”这类传统史著的窠臼。所以，高层政治的研究，尽管搞得热闹，但可能未必有多大的知识“含金量”。相对于高层研究而言，底层的研究可能更具真实性，更扎实，更接地气，也更具有方法论上的挑战性。这就需要我们俯下身，更细致地观察底层社会，打通城市与农村，上层、中层和下层的畛域。

在文革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城市，看的是运动在城市中的翻天覆地，而把农村看作是“风暴眼”中比较平静的海域，在城市运动辐射下处于“被动”形态。有论者解释这种现象时，归因于“四清”中已经整过农村基层干部了，已经释放出了运动的能量。这当然是一种逻辑推论。实际上，在貌似平静的下面，文革运动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柳福禄的“现行反革命案”为例，我们是可以从政治、法律、社会的不同历史维度，分析文革对农村社会的多重影响。

1. 文革运动的时空差异。文革的运动过程，在城市与农村是有些差异性的。在城市中，文革运动的主要体现是“路线斗争”，群众造反夺权的斗争矛头指向是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农村，文革运动的开展，主要还是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斗争的对象主要还是“四类分子”，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冲击时间短、力度小。

从文革开始起，“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生存状况就在不断恶化。他们境遇的变化，是观察农村文革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农村文革的不同时期，“四类分子”扮演了不同的“运动”角色。在造反动乱时期，“四类分子”是政权用以发动群众参加运动的祭旗牺牲品。一些派性武斗激烈的地方，还发生了集体打杀“四类分子”的极端现象。在重建秩序时期，“四类分子”又是政权用以杀鸡吓猴，震慑农民的政治道具。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虐杀“四类分子”的事情一般不再发

生。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压迫，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窒息性压迫，是每一个“四类分子”及其家庭都无法逃避的命运。

柳福禄的“现行反革命案”，发生在农村文革的稳定秩序阶段，反映了农村基层政权在重建权威过程中整人立威的政治需要。这一案件的发生、侦查、复核和平反，反映了文革政治气候的变化。柳福禄在课堂上所谓“攻击恩维尔·霍查”的事情，当时大队革委会已经上报过，但证据不足，上级公安部门没有立案。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件事又被提出来，列为“现行反革命”案件进行司法审理，这就是所谓赶到“点”上了。在纠正“捕杀”过多的政策调整时期，柳案又重新复核，做出了“证据不足”的结论。直到文革结束后，这个无中生有的案件，才得以彻底平反。这里可以看到，地点和时点在案件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作用，这是政治不稳定性的表现。

2. 法律被政治的扭曲。在文革中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的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这是司法观念的倒退。1951年镇反运动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反革命分子指的是确有反共反政府行为的人。1956年，中共中央重新规定的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界限中，就有了言论的反革命罪行。即“以文字、图画、言论或其他方法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谣言的分子，或投寄反革命恐吓信件的分子”。到《公安六条》，反对毛、林就是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以对领袖的态度而定反革命罪了。在文革中，大量的现行反革命案，都是“恶毒攻击”毛、林罪。许多无意中毁坏了毛、林像和毛、林语录的事情，一些小孩子在报纸上乱涂乱画的事情，都被当做是重大政治案件，很多人因此被批斗被判刑。由对领袖的维护，发展到对领袖象征物的维护；对领袖象征物的不恭，也就是对领袖的不恭，就要治罪。这是个人崇拜发展到极端，必然导致的巫术化现象。在柳福禄这个案例中，办案人是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当成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成员了。对霍查的不恭，也成了现行反革命的罪行证据，整个推论过程显得十分滑稽。

从司法过程来看，文革中，军管政法机关，取消公、检、法，建立人民保卫

部，是司法制度的倒退。柳福禄“现行反革命”案件的侦查，就是文革办案的典型案。军人代替警察办案，以政治统帅司法，办案不讲程序，审讯大搞逼供，群众揭发检举，组织对当事人的群众批斗会，威胁当事人和家属，诈取他们的口供……，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用群众运动方式办案的样本，各个环节都非常齐全。案件呈报的法律文书，其实就是大字报式的政治批判檄文，充满了各种空洞的政治口号，但对案情本身却缺乏有效的证据要件。

3. 社会政治身份的强化。“四类分子”是国家的政治贱民阶层，在文革前，他们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符号，每次政治运动都是拿他们开刀。而在文革的“继续革命”中，不仅对“四类分子”的专政更加严厉，而且更加突出了以家庭出身作为政治标准的意义。阶级斗争的庸俗化和符号化，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文革的农村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身份社会，由于对“四类分子”更为严格的管制，“黑五类”生存环境的全面劣化，从而降低了农村社会的文明尺度。出身好的莠民依凭天然的政治优势，欺辱出身不好的良民。柳福禄与他的邻居关系由好至坏，就是这样发生的。

在这个案件中，还可以看到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治人物与知识人物的冲突。具体讲，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柳福禄是农村的知识分子，大队革委会主任蒋德春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他们结下的“疙瘩”，产生于农村的整党建党运动。柳福禄给群众解释农村整党是群众性整党，这是按照中央规范性的说法讲的。但这在正要过整党关的蒋德春看来，这就是要让群众给他过不去的挑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蒋德春要把柳福禄的事情办成一个“现行反革命”案，固然有打击报复的成分，更重要的还是要借机整人“立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案件也反映了农村基层社会在文革运动中，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冲突。

4. 农村政治生态的全面劣化。文革以阶级斗争的利爪，撕去了农村社会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把人与人的关系高度政治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小摩擦，邻里之间的小磕碰，都会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们的是非标准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协调机制全面失灵，动辄无限上纲，许多小来小去的事情都上升到政治高度去认识，邻里之间的磕磕绊绊也都不会相让了。而且，在阶级斗争的旗号下，用政治陷害的手段嫁祸于人，成为一些人的行为方式。在农村社会也是如此。柳福禄是屡遭政治陷害的苦主。柳福禄与邻居徐连玉等人的矛盾发展，

都试图在政治方面给对方上纲上线，以至于搞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亲不亲，阶级分”。在这个邻里矛盾的发展中，出身地主家庭的柳福禄显然落于下风。他们的邻里矛盾在乡村的文革政治背景下，被人利用，被形势放大，最后，造成了柳福禄遭受政治陷害的结局。

这个小学教员的现行反革命的案例，实在有非常丰富的多重维度。本文的梳理还是比较粗浅的，只是掀开了帷幕的一角，但已经可以看到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解读的。笔者认为，观察文革的多重社会面相，需要有不同的视角，而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底层视角。底层视角能够提供许多高层视角所不能看到的问题。国家政策实施的正负效应都是由社会来承担的，由百姓来承受的。特别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是一个国家公正性的体现，只有从社会弱势群体的视角中，才能看得见一个社会的文明底线。从研究角度讲，高层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缺乏足够的信息透明度，研究的公开空间比较狭小，流行各种各样的“阴谋论”。而底层研究有着广阔的研究天地，它所提供的丰富性，可以使我们更加接近真实的历史场景。这可能是破解各种阴谋论的不二法门。这个广阔天地，真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本文作者，1954年8月出生，山东省鱼台县人。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当代史，中共党史，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作者说明：本文根据友人王锦思提供的柳福禄档案整理。按照学术规范的要求，本文的人名、地点已进行了相应的技术处理。

2015年5月11日

【要有光】

胡杰大饥荒组画的视觉冲击

依 娃

说到胡杰，他在国内的名气，远不及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这样的名导、大腕那么显赫。却在海外知识分子圈内广为人知，是因为他所拍摄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我的母亲王佩英》等均在阳光卫视上放映，近年并

在香港出版。观者随着他冷峻、深邃、富有历史正义感的镜头，从中了解到反右、文革、一打三反等腥风血雨时代的荒诞、残酷、非理性和对人性极端的扭曲。人们也认识了这个留着一脸大胡子，辞去公职，四处奔波，极力为寻找历史真相而不辞辛苦的画家、独立纪录片导演。不少人赞扬：“林昭是英雄，拍摄林昭的也是英雄。”在林昭的片子中，胡杰面对镜头说过一句话：“有些事情，是比生命都重要的。我一个男人，如果为此坐几年牢，也没有什么。”在我心中烙下深刻的印记。



认识胡杰，缘于我尚未开始做大饥荒口述历史的调研，在寻找资料、广泛阅读的阶段。听说胡杰拍过有关河南“信阳事件”的《粮食纪念碑》，这部片子曾经在2008年纽约大跃进5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放映，颇受关注。我多处打听，辗转联系到胡杰索来一看，并对胡杰进行了电话采访，整理出《中国第一座大饥荒纪念碑》，发表于海外网媒。记得胡杰在受访时说过：“我关注的不仅仅是死亡的数字，我觉得作为一部记录片不只是反映发生了什么，而是去探索为什么？我想用具体的细节纪录那个时代，去感受饥民们坐以待毙时的绝望，去抚摸他们空空的肠胃。让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变成可见可感的，让数字成为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不可替代的。”河南光山县老农吴永宽是第一位竖起大饥荒纪念碑的人，胡杰是第一位拍摄大饥荒题材的导

演。著名评论家胡平先生称这部片子是“大饥荒时代的有力见证”。

2013年我出版了《寻找大饥荒幸存者》一书后，开始了对陕、甘逃荒妇女儿童寻访、整理、写作。亲历者所讲述的许多细节，让人耳不忍闻，每每笔录，总觉得许多场面、感受都是言所不能及的。众所周知，在大饥荒年月，中国人大多出于赤贫状态，衣不遮体，食难果腹，就是城市居民都不可能拥有一架照相机。再别说饿死人、人吃人的穷乡僻壤边远地区。就是有个别拥有照相机的新闻记者、政府干部，谁又有几个脑袋敢去拍摄那些饿殍遍野、赤地千里的悲惨场面呢？说一天四两吃不饱肚子就是现行反革命罪了。比起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在日军的纷飞战火中，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数百张令人心灵震撼的黑白照片，令那场大饥荒惨景永久的定格。但是1958年—1962年的一场饿死数千万农民的大饥荒，几乎没有任何图片、影像的纪录留下。今天我们能寻找到的照片、宣传画、纪录片等无不是莺歌燕舞、人欢马叫、换了人间的美好天堂图景。

人们常说，一张好图，胜过千言万语。在整理这些幸存者口述的过程中，我常常觉得文字的无力和有限，产生出需要请一位画家来做插图，以给读者带来生动的展现、直接的冲击、强烈的震撼，从而给人们留下大饥荒不可遗忘的视觉感受。以补充语言和文字的不足，填充没有老照片的缺憾。

“可以给我的书画些插图吗？”我小心翼翼地写信求问，因为和胡杰不曾会面，尚不相熟。“我来试试看，这对我也是一个挑战。”

我先后寄去我所需要的十五副插图的有关背景文字，没有对胡杰提出任何建议和要求。首先我认为艺术创作是一个人的事情，旁观者不可以“指手划脚”。更重要的，我完全信任和尊重他。知道一个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画家，一个多年调研、拍摄近代中国历史的纪录片导演，会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用异于他人的表现手法来创作。

记得不到一个月，胡杰把完成的插图电邮过来。我迫不及待地打开，那种黑白版画正是我这本书所要的严肃、悲苦风格，效果出乎预料的好。当我一张张打开，画面准确的展示、人物生动的表情、细节的独具匠心，让人看着惊心动魄。那瘦得能数出肋骨的尸体，那分手再也见不到恋人的姑娘，那被陌生人不知要领到何方的小娃娃，那在火车站让素不相识的男人往家领的逃荒女子……。不需要

文字，不需要解说，光是看着这些黑白两色的画，就能让人想象出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那个人连吃饭的权利都被极权统治剥夺的年月，就能让人悲伤涕泪，心碎如粉。我在心里连连叫喊：“胡杰真棒！我找对人了，这就是我这本书所要的插图。”优秀的书籍插图不是图解，而是用绘画形式的一种思想，一种表达，一种情感流泻。有位作家说，好题材是老天赐给的。我给胡杰回信说：“这些画，也是老天赐给我的，让她永远和那些苦难文字在一起。”

我对美术一窍不通，请教胡杰，这是什么艺术形式？胡杰回信说：“这组画的手法的学名叫木刻版画，是先用刀在木板上刻出画稿，然后再用纸拓印下来。就像宋代发明的印刷术的原理，这在没有现代印刷设备的年代，逐渐形成一种美术样式，多应用在书刊杂志，也形成独特的艺术样式，可以有独立的展览。在上个世纪初，欧洲艺术家用这个艺术方式创作了很多伟大的作品，尤其是在批判社会、反映苦难现实方面很有表现力。1930年代，鲁迅在上海大力宣传，木刻版画的普及，加之当时中国的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使木刻版画的创作形成了一个小高潮。也使这个画种在中国扎下了根。但随着照相机和现代印刷技术的普及，木刻版画悄悄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我这组画仅仅是用了木刻版画的黑白形式，但不是用刀刻的，是先用毛笔画，当然是要把笔当刀一样使用，再使用电脑制作完成。”胡杰为人非常谦虚，征求了我的意见后，又修改了其中的三副画。让这组作品更加贴近那个时代，更能传送出饿鬼的呻吟，妇幼的血泪。胡杰怎么创作的，无人晓得。他是让作品来说话。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经受过饥饿、挣扎、痛苦、绝望地死亡后，一个美术家的笔端下还是歌功颂德、风花雪月、无病呻吟，那将是这位美术家人格的耻辱，道德的沦丧，艺术的绝境。直到今天，大饥荒这个话题依旧是不可触碰的禁区。在为数不多的大饥荒研究、纪录领域，电影、音乐、美术、文学等一直都是处于缺席的状态。导演追求票房，作家忙着攀排行榜，画家着急着拍卖捞金……。现在，在大饥荒过去后的五十多年，终于有了胡杰，有了胡杰的大饥荒版刻组画，它不仅仅是我一本口述历史书的插图，而是中国美术人的声音、良知和正义的呐喊。

我把胡杰的画转发给一位好友，他十岁的儿子正在学画。他就拿给他的儿子看，孩子说：“太残忍了，我看着心里不舒服，我不想看。”我对朋友说：“让一个还不谙世事的孩子看这些画，对孩子来说太残酷了，等他长大些再看吧。”

不知胡杰的这组画在未来的多少年后，能在中国的某个美术馆公开展览？能在某个出版社公开出版？但是，我知道，在胡杰完成这些作品的一刻，它们就已经留存在中国美术史上，留存在中国大饥荒研究史上。更是留存在人类文明进步的血迹斑斑史册上。希望更多的人看到胡杰这组大饥荒组画，面对它探究那场饿死3600万同胞的大饥荒。

胡杰，请接受我深深的敬意。■

【要有光】

我是逃荒者的后代

依 娃



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母亲，就不会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的母亲，就不会了解自己。因为母亲是树干，自己是这棵风烛残年老树上的果。

四十多岁以后，我觉得不了解自己的母亲。她是怎么从甘肃来陕西的？她过去遭受过什么？她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知。我跟随母亲回到甘肃秦安老家，我多次和母亲交谈，询问……。

（插图三： 我的父亲是陕西农民，母亲是甘肃逃荒女子，我是逃荒者的后代。这个身份是我与生俱来的，却让我寻觅了四十多年）

几年来，我反反复复地想着我和父亲、母亲的关系，我终于明白这一切都不

是他们的错。虽然他们会说话，是人的模样，但是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只是像牲口一样劳动，连饭都吃不饱。我父亲一辈子吃的都是红薯苞谷，所以经常犯胃病。积劳成疾，所以他在六十四岁上就过早地去世了。我终于能够体会，七岁那年送我走，母亲一边纳棉袄、一边准备干粮，送我到车站的疼；父亲千里迢迢送我到姑妈家，自己独自在咣当咣当的火车上一路回来的疼。骨肉分离，怎么会只是一方的疼呢？怎么会只是一边流血呢？只是多年来，我只知道自己的委屈、自己的不幸、自己的苦楚。

认识了母亲，了解了母亲后，我终于明白，我是大饥荒幸存者、逃荒者的后代。我的血液里流淌着甘肃人的血和陕西人的血。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十年了，我的母亲已经七十岁了。母亲老了，牙齿掉得差不多了，安装了假牙，头发全部白了，时不时让人给染成黑。走路慢腾腾的，喜欢让我像牵一个小孩走路那么手牵着走路……。

我总算在他们漫长的记忆里、苦难的遭遇里、骨肉分离的血水里，一点点一丝丝地找到自己。我终于看到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烙印——农民的女儿，逃荒者的后代，大饥荒的证明！

写下以上的文字，好像和这本书的主题“逃荒”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我想让读者了解到，大饥荒过去了，农民的饥荒、吃不饱并没有过去。她们逃荒到陕西生活下来，并不是“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依然缺衣少食，送儿送女，一生都在贫穷熬煎、逆来顺受中苦苦度日。

母女分别，这是我的伤痛，更是母亲的伤痛。我只是想写下一个甘、陕逃荒婚姻所生育的一个孩子的遭遇，揭露出这个烙印和伤疤。我是逃荒者的女儿，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有了我的叙述，我们家的逃荒史才相对完整。当我近年知道这场大饥荒饿死了中国 3600 万~4500 万农民，很长时间，我都认为大饥荒是上辈人的，我自己没有经历过。

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的母亲是甘肃逃荒者，我的父亲是陕西的农民，他们是典型的甘、陕逃荒婚姻，我是他们生的孩子。因此，我和这场大饥荒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大饥荒是他们的，也是我的。甘、陕大逃荒是他们的，也是我的。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身份证——甘、陕逃荒婚姻的后代。■

【随 笔】

套话种种

——“红色话语”小议之四

启 之

有一个脑筋急转弯——

赵本山：请听题，当官的要精通哪四种语言？

范伟：英语、法语、俄语和日语。

高秀敏：错！假话、空话、大话和套话。

在这四种话里，假话、大话、空话不用解释。套话值得一说。

什么叫套话？《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特指套用现成的结论或格式而没有实际内容的话。”这种定义似乎没有考虑到礼貌语——“吃了吗”、“慢走”、“Hi”、“Hello”有什么实际内容？它们算不算套话？

照我看，套话至少有两种：礼貌套话和政治套话。借用自由主义宗师伊赛亚·伯林的说法，礼貌套话是积极性套话，政治套话是消极性套话。“谢谢”、“请关照”、“多保重”虽然是套话，但不可或缺。说它是“积极性”的，并非过誉。这类话落实到书信中，就成了“钧鉴”、“敬禀”、“撰安”、“不另”一类的尺牍套话。钱钟书写八行笺，从不打稿，一气呵成。与其说这是天分使然，不如说他熟悉套话。请看钱钟书致陈梦家的信：

梦家吾兄教席：

不晤数旬，估想佳善。顷得顾起潜书附一纸嘱转致记宝，即附并祈收。

并颂日祉不备。嫂夫人均佳。

弟钱钟书再拜。内人同叩。十月四日夜

全信54个字，名字、称谓、日期用了13个字，有实际内容的19个字（顷得顾起潜书附一纸嘱转致记宝，即附并祈收）。套话占了22个字（不晤数旬，估想佳善。并颂日祉不备。嫂夫人均佳）。《中国尺牍文学史》专门附录了“尺

牍套语”。作者赵树功告诉人们，文言尺牍“除主要内容外，其它多有习惯的套语。”¹这类套话无实际意义但很有用，它是礼貌、教养、文化程度的标志。没有它，人家就不高兴，社会就不和谐，事情就办不成。

政治套话多用在官场和公媒上。这些套话使用最多的群体，以前叫国家干部，现在叫公务员。有好事者，在网上把这类套话分门别类地开列出来，并且举例说明，比如：

对于这个问题，党和政府已经给予了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

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一贯要求和传统作风，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

这类话之所以消极，因为它让人想起了官场的贪腐和不作为，想起“狗掀门帘子——嘴的本事”的歇后语，想起了“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新风尚，所以，说了还不如不说。

有人把政治套话比成八股。这不对，这种套话跟八股不挨边，八股虽为形式所囿，但“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不但有益于逻辑思维，而且还把你训练得文精意赅。“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有什么逻辑，有什么文采？

把政治套话说成是“党八股”还庶几近之。毛泽东给“党八股”开了八条罪状，至少前四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都可以用在这种套话上。

“党八股”生于延安，政治套话生于何处？老革命说也在延安。何方回忆，那时候，每天晚上点完名，指导员都要讲话，内容除讨论连队上存在的问题外，大多是空话、套话、车轱辘话。人们不胜其烦，编了一个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导员来讲话。

这位指导员从哪儿学来的套话呢？老革命说“抢救运动”。这个运动产生了

¹ 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页638，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一种新八股。尽管“四人帮”及其追随者赞之为“延安文风”，但“其专横武断、不要证据、强词夺理、不容辩驳，空话套话，永远正确等，绝不在旧八股之下。只是引证马恩列斯改成更多地引证毛泽东就是了。”何方建议，将1943年的《解放日报》抢救运动中关于坦白的报道，与大跃进时期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关于“放卫星”的报道做一对比，就可以看出这种新八股的绍续继承。¹

如果深究一下这类套话的血缘家系，就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它是权力与媒体的私生子。权力要宣传，宣传靠媒体。媒体不愿意宣传，权力就诱之以官禄德，将媒体软硬兼施拉入房中，媒体不得不从。为保全脸面，只好向外界宣布，它们是自由恋爱自愿结合。以后的事，无须细数——媒体把那宣传重复上成千上万遍，弄得人人耳熟能详，张嘴就来，成了条件反射。于是，政治套话呱呱落地。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不同的政治产生不同的套话。德国语言学家维克多·克莱普勒发现，第三帝国“发展出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人民团结、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即使在纳粹灭亡以后，那一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²

遥想当年，我们在这方面也毫不逊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东风浩荡，春雷滚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类的文字见于报端，闻于广播，腾于众口，大会念小会读，日记抄信里写。干部讲学生说，无人不晓，无处不在。它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心理和行动。要是深究文革发生的原因，这类套话的“父母”不能辞其咎。

重庆文联的退休干部杨世元在1962年7月的日记中，抱怨1959年“反右倾”后的副刊难编，尤其是言论稿子不好写，要写也只能是套话。他把当时的套话概括为两句话：“‘三六九’一味药，医不好糊涂症。”“所谓‘‘三六九’一味药’，是我总结那几年宣传工作中的常用套话：虽有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但我们有六亿人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只要高举三面红旗，坚持六条标准（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纵有问题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在文革中，这则日记成了“黑话”，他被批了一个月。³

¹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下，页434，利文出版有限公司，2005。

²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2008，页270。

³ 杨世元口述：《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昨天》2012，第6期。

前北大副校长郝斌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其中讲到了套话与政治运动的关系。他的老师荣天琳，根正苗红，父亲是本溪的钢铁工人，本人是辅仁大学的历史学研究生、助教，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四十年代就是地下党，1952年调入北大历史系，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副主任。1957年春天，“许多知识分子向党纷纷进言之时，他怀着一颗同样真诚的心，把自己的一得之见，写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文章讲了两点，一是建议为民国修史，二是呼吁给陈独秀应有的地位。反右来了，他被撤了系党总支副书记。“此后的荣天琳，就像是换了一个人。……再也不拿笔写文章。”不写文章可以，开会不发言不行。而这位荣老师的发言“本来几句就能说明白的話，他却要前序后跋，赘语甚多。”这让当时才而立之年的郝斌大为不满：“他自己不怕拗口，可像我这样刚出茅庐的毛头小子，不知世事的艰难，听起来就觉得相当费力。”这里的“费力”，包含着不厌其烦的意味，只是因为顾及师尊的面子，不好直说。

在讲完这件事之后，郝斌发了一通议论：“当年能以一股清新的锐气去冲击教条主义的人，如今却落得讲课、发言，不靠套话和教条即无以自保。这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不幸呢？……一个荣天琳如此，那可以说是他个人的事，活该了；如果有十个、百个荣天琳出现，那就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的悲哀。那么，千人、万人如此，大学教师、报刊编辑、公务人员，引导社会舆论的各个行当，都染上这种病，那是不是我们的民族性出了什么问题？要不要从这个角度反省一二呢？说这话虽然有点危言耸听，但我是担心这种东西渗入我们的基因里去，会乱了我们的民族性。有那么几年，年头不算少，相当一群人，大家都要以社论的腔调说话，说者自然地说，听者自然地听，彼此两两相安。事态到了这个地步，该不该有所警醒和反省？”¹钱理群说，鲁迅批判的是旧国民性，而近半个世纪，我们有了新国民性。这个新的是什么，以前有些恍惚，看了郝斌的书多少有了眉目。

然而，我没有能力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去反省民族性，只能反省一下自己当年的语言——翻出文革时的日记和通信一看，我发现，自己跟荣天琳也差不多，连写日记也是套话连篇。再看张新蚕的《红色少女日记》，王林父子的《文革日记》，邵燕祥、杜高、李慎之、赵丹等人的检讨交代，稍稍安了心——那时候大

¹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页117～120，大块文化，2014。

家都这么说，这么写。

后来看了巴金的《随想录》，才知道，套话也分等级。我的套话，不过是小儿科，最高级的套话，是巴金谈到的：“四人帮”打倒了，一些写了大小“走资派”的作品出不了。“脑子灵敏的人会想办法，便揪出‘四人帮’来代替……于是我们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种由‘反走资派’变为‘反四人帮’的作品。这样一来，吹捧‘四人帮’的人又变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¹

干部要守纪律，套话非说不可。媒体是喉舌，套话不登不行。那么，为什么一般民众也要说套话呢？这是因为套话有两大好处，一是安全，二是省事。安全的功效是眼前的，省事的功效是长远的——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抄来抄去，脑袋就长到人家肩膀上去了。

《一九八四》年中的语言学家塞纳和他的同事们，在“老大哥”的指导下努力创造“新话”——“世界上唯一一种语汇总量在日益减少的语言”。创造的办法就是消灭单词，“几十个几百个的消灭，”反义词一个不留，“把语言剔得只剩下骨头”。²新话的目的，塞纳说得明白：“就是窄化思想”，“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每种必要的概念将被一个单词精确地表达出来，这个单词的意义有严格规定，其他次要意义将被消除，然后被忘掉。……年复一年，词汇量越来越小，意识的范围越来越窄。……语言变得完美时，革命就完成了。”³

其实，要达到上述目的，消灭单词是个笨办法，聪明而省力的办法是大量地制造套话，大力地推广使用套话。塞纳们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套话就是重复，重复某些词汇，重复的结果必然会使词汇减少。与此同时，套话中词汇的词义也就会因此变窄，一词多义的现象从此消失，而那些带异端色彩的词汇也就歇了菜。塞纳，确切地说，奥威尔，没有看到，套话才是控制思想的最高境界。

毛泽东说“党八股”害党害国，要大家赶紧把它扔进垃圾桶里去。作为“党八股”的堂兄弟，政治套话也不应享受更好的待遇。但是，你可以告别司徒雷登，却告别不了此类套话。为什么？上面说了，套话的老爸是权力，老妈是媒体，你不把这两者拆散，这种套话就永远跟着你。■

¹ 《随想录》页45，北京，三联，1987。

² 《一九八四》页37，上海，译林，2008。

³ 同上，页38。

【札记】

读萧军《延安日记》（五）

——萧军笔下的延安文化人和文艺界

胡庄子

当时,大批文人来到延安。“不管你工作和休息,总会有饭吃,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人认为吃饭是受人‘恩赐’,或者像外面一样有吃‘下贱饭’之感。”(奈尔《“吃”在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日)“写不写,写多或写少,一种作品写作时间的长短,并无拘束。反过来说,公家虽保证他们基本生活,并不要求一定的写作。”(赵超构:《延安一月》)。那时,延安已经开始对文艺人采取包养的办法——这好像是个创举。萧军身在其中,单位是“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他把对延安文化人的观察和感受写在日记中。

他说:这里的作家共分——特等:如茅盾,小厨房,双窑洞,男勤务和女勤务,开销不限。甲等:每月十二元津贴,不做正常工作。乙等:八元。丙等:六元。工作人员:四元。(40-9-26)

他说:我知道真正的正直人性,是存在于下层工农的心中,群中,我将要一生为他们而服务。我憎恶一些阴邪卑琐的小知识分子,他们除开狗性——还没有狗那样忠诚,忠于职守——底摇尾与取媚,再就是啮咬同类的本领而外,是什么也没有的,我看厌了这类东西,可是围绕我的却大部全是这类东西。(42-6-21)

他说:我对那些不长进的党作家,是开始在我心中降低了他们为人的分划,我感到他们有一种不洁的东西,蒙蔽了自己的灵魂。(42-6-25)

他说:我很为共产党一些文艺方面的作家们抱以悲观,眼见他们将一个一个地降落到文学的庸人,政治上的赘瘤,我懂得我是一天一天地和他们远离了,他们将要是艺术的罪人、堕落者……可耻的阻碍者。(42-6-27)

他说:党作家,一钻入党,就忘了艺术,忙于自己党内地位底获得,结果变成一些文艺小政客。党外作家,容易对政治引起冷淡甚至憎恶,采取不合作办法,自我完成,结果也许走上个人的艺术至上主义。(41-6-8)

他说:为什么在延安的诗作者满足口号,名词,术语……原因安在?(41-3-19)

萧军曾给毛泽东讲述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他说：党内：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毛泽东听了，他很为这些事所焦急！他说：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呢？（41-7-20）

他说：天真和脸皮厚是一般中国诗人特征。（42-9-8）

他发现：一个政党他们只需要一个能够把他们的口号、决定等披上一层艺术的外衣，达到一种目的的作家就够了！它们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是无趣味的，至少在目前。（43-2-8）

他说：共产党是还不懂得文学的真正价值的。（43-7-6）

他说：谦卑过度几是献媚。这可以说明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学者”们的作风。——他们已流于无条件的献媚了！这是人类奴才性的遗留。（43-10-15）

萧军分析了延安整风中文艺界人士中出现的一个倾向：近来为了响应一种政治的号召，有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们忏悔得已经失去了一个为人的原则，到了可怜、可耻、不可信甚至谄媚的地步了，这不是好现象，也不是正路。（43-4-2）

他说：将来文坛的趋势，凡是有些才能和骨气的作家，他们一定不属于国民党也不属于共产党，这两个党里面留下的，恐怕只是一些一般的人！（40-8-15）将来第一流的作家，任何党内也不能存在，存在的尽是一些二三流的呼“万岁”之辈，他们也正需要的是这类东西。（42-6-15）

萧军看了郭沫若的《屈原》，在日记中写道：先看他的写后记，觉得这人卖才情，酸溜溜的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这也许是我的成见，这位“自伤薄命”的新士大夫我是越来越为他肉麻。他所崇拜的两个人物——歌德，屈原——也正是我所无趣味的。散步时忽然想到这样两句诗，倒可以赠这一流人：革命投降两自由，果真名士“风流”！（43-2-2）他看了被中共推崇的、在《解放日报》4月18—19日发表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叙述明末老闯起义的故事。本文除开在侧面尽了一些讽刺的政治作用——也很薄弱——而外，其余是没什么特奇之处，只是把一段段历史抄来解释一番，而且见解也平庸繁琐，主题不鲜明，缺乏深度。总之我对这个人底勉强学“学者”的酸气感到无味，更是那种卖弄读过几本书的腐气。（44-4-18）

他说：新来的党员草明，她第一关心的是这里的待遇、津贴，接着她就争津

贴，多领馒头，支使小鬼吵着送孩子……。另一些党人们，——如刘白羽之类——充大作家，装病，进女同志房子挨耳光等……我竟生活在这样的人群里！

（41-6-4）

他说茅盾：他总是那样八面见光，模棱两可做人处事的办法，我们是在为人上有着一种根本不能调和的东西。他戴一顶小睡帽，睡衣，躬起背在桌边吸烟。

（40-9-13）茅盾是个暴露性，自然主义倾向，市民的作家。他的书除开告诉人一些故事和事件外，我是没有欲望读第二遍的。作家的人格，感情，思想，……全感染不到。（43-1-27）

他读了何其芳的诗和立波的文章，认为“这真是世界上最恶劣的东西！”

（41-6-10）

他说诗人艾青：艾青这个人是个不可靠的角色。（41-9-1）他拿一块平凡的石头，硬要我相信那是某种动物的化石。他骂艾青：这是个叭儿狗似的人物，一跺脚他就流尿的，叫着乞怜人底同情。（41-10-2）艾青是最卑贱的人……他是以破坏公共秩序为满足的。（41-10-18）这个卑怯的可怜的贪心的小狗，时时刻刻要卖弄他的聪明。……一只刁狡的狐狸。（41-11-5）艾青的诗是水掺得太多的酒。（41-11-27）

他说丁玲：这个可怜而幼稚的人，是可悲的。（42-6-13）唯一缺乏的是刻苦和意志力。（43-1-6）

他说：在这里反对我的人，已经有一批可观的数目了：周扬，雪韦，何其芳，丁玲，以至……但我是顾不顾这些的，我是对的。（41-7-29）

他说：我是内无朋友援助，外有更多敌手的人。（41-8-3）

他说：舒群近来为了表现党性，是也不惜在那里有意无意咬着我的肉的，他是善于保护自己的人。（42-7-25）他看到舒群写的短篇，评价说：作为一个党员他们是算“进步”了，作为一个作家，我却感到他们越来越遥远了！我已经看到了他们那惨淡的前景！（43-4-2）

萧军向毛泽东介绍一些延安文人，他说：艾青，他只是个优秀的诗人，决不是个伟大的诗人，他缺乏深厚的一个伟大的心胸。塞克是保守既有者，舒群是只能鼓励不能打击，常凭感觉用事。罗烽能做事，精明干练，但缺乏一种容人容事的力量，偏狭，带有过去秘密工作的作风。（42-4-27）

萧军多次在日记中表示对某些人的彻底失望，“已经到了再不能和解下去的时候，我决不再对他们有什么友情的幻想”（42-2-28），“开除了他们以及类似的此类‘朋友’”（42-6-4）

他说：一些党作家们是那样吊儿郎当，他们又在打牌了，这使我想到了爱伦堡那两句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却是荒淫无耻。”这话鲁迅先生曾引用过骂国民党的，我真担心共产党中某些人不要再被应用上啊！（42-7-15）

他说：看着重庆文坛上郭沫若等在那里玩花头，引起了自己称王称霸的竞争心意。论历史论人事，郭、茅全比我优越些，但我却要以超人的力量，把这些老物竞争下去，……这些好胜的野心常常辛苦了我！（42-5-8）

他说，要“扫荡文坛”。（40-9-26）

他和几位作家闹矛盾，甚至于产生一些他的传说与闲言碎语。比如，艾青曾对人讲，萧军向他老婆调戏打口哨。（42-8-31，42-9-2）萧军在日记中写道：“谁吃我的醋，我就跟谁的女人睡过觉……”（42-9-14）有些耍赖皮的意思。

在日记中可以看到，延安时期，有“文化人对不起边区老百姓”的说法。（42-2-6）

萧军辩护说：“一个作家，就是在边区尽在睡觉，他也在工作着，因为他的书在工作着，这不会比一个宣传部长的事情更少……。”（42-2-6）这倒是一个很新颖的说法，可以成为一句名言。不过，这种说辞在当时，对一个需要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才能生存、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夺得政权的党所面临的严酷现实来说，可能是无力的。■

【序 跋】

究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文革在山西》序

丁 东

李辅先生完成回忆录《所思所忆七十年》后，告诉我他和一些朋友正在撰写山西文革史。不久，他给我发来了有关张珉、赵凤歧事件的章节，我感到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于是向《炎黄春秋》推荐，很快得到答复，提炼一篇8000字的文章，这就是石名岗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发表的《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始末》。“张赵事件”我早就知道，朋友赵诚曾经参与其中，徐晓当年因“第四国际案”入狱也与之相关。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相似经历的人在其他地方已经被社会尊为反“四人帮”英雄，在山西却被判处死刑。若非胡耀邦出面干预，张、赵能否死里逃生都是疑问，回想起来真是惊心动魄。

今年十月，李辅先生又发给我本书的全稿，我读后感到很有分量。书写一省范围的文革史，本书虽非首创。但以丰富的史料把文革在一省的来龙去脉叙述得这样清楚的著作，尚不多见。中国的地方政治头绪相当复杂。从纵向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横向看，有山头与宗派、整人与挨整，造反与保守、军队与地方，台上与台下等错综复杂的矛盾。本书搜集了大量一手史料，正视各种矛盾，对复杂的头绪条分缕析，提供了毛泽东时代地方政治的一个珍贵样本。前些年，有些山西政坛上的前任高官，在文革风浪的颠簸中曾随波逐流，以实用主义的政治伦理谋求利益最大化，然而，晚年却要利用官方修史的话语权，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文革受害者和抵制者。这也成为作者还原历史真相的动力。本书把这些高官当年的言行原原本本地摆出来，这比任何事后的化装更有说服力。

本书不单纯是石名岗先生执笔的个人专著，而是一个群体数年切磋的心血结晶。在这个写作群体中，不少人在山西曾是文革期间的风云人物，担任过群众组织的领袖，结合进某一级领导班子，后来在清理“三种人”中出局。他们对于文革期间的胜败沉浮、悲欢离合，有非同常人的体验，铭心刻骨的感受。文革发生至今快半个世纪了，岁月无情催人老。文革中的活跃人士，最年轻的也早过了花

甲之年，还有的已年逾古稀。亲历者为这段历史作证，具有时间的紧迫感。文革研究，对于学院派学者来说，难的是入乎其内。对于文革当事人来说，更大的挑战是出乎其外，跳出个人恩怨、荣辱得失看历史，超越派性局限，把文革放到更广阔的视野中审视。

叙述文革史，人们最熟悉的是两种语境。

一是毛泽东语境。代表性的文件是“五一六通知”、“五七指示”、“十六条”、中共九大、十大政治报告。基本观点是：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发动文革，不仅是把反修防修的战场转移到国内，揪出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还要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揭露黑暗面，进行一场把全国办成共产主义大学校的试验。“五一六通知”说的是文革要破什么，“五七指示”说的是文革要立什么。毛泽东语境在他当政时，当然占据着舆论的统治地位。80年代后一度式微。近些年中国权力资本化蔓延，官民矛盾加剧，毛泽东语境大有复苏之势。

二是邓小平语境，这是当下中国的主流语境，代表性文件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观点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应当否定。否定文革，是启动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契机。但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不能忽视的背景，是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博弈。邓小平在文革中受批判，华国锋在文革中被提升，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为邓小平陈云掌控中国政坛建立了历史依据，为他们在人事上进一步清除文革受益者奠定了舆论。为了尽快摆平党内的各种恩怨，邓小平提出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简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谱。在这种光谱下，回避了党内各级官员在文革某些阶段努力紧跟毛泽东的事实，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老一辈革命家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宣传需要在维护毛泽东旗帜和否定文革之间达成平衡，所以把文革的罪责尽量归结到林彪、“四人帮”和造反派头上。三十多年来，《决议》成为国内关于文革的宣传准绳。官办传媒流通的有关文革的史论著作、传记、年谱、教科书、回忆录及各类文艺作品，几乎都是邓小平语境下的叙事，鲜有例外。这不但是宣传纪律的刚性要求，也成为市场利益的主流导向。

毛泽东语境和邓小平语境对文革结论相反，但在史学服从于政治权力的层面

是共通的，都属于史官文化。顾准说，“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史学还有一种境界，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研究文革，能不能超越史官文化，从以官为本走向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超越毛泽东语境和邓小平语境，进入独立的语境，便成为文革史研究的挑战。

对于国内一般文革研究者来说，超越邓小平语境很难。对于有造反派经历的人来说，超越邓小平语境并不难。因为邓小平让造反派吞咽了文革失败的苦果。但超越毛泽东语境却不易。有相当一批造反派思想上仍然没有超越对毛泽东话语的路径依赖。因为自己人生最活跃的时光定格在文革年代，就沉浸在曾经得到毛泽东支持的荣光中，而不情愿面对毛泽东对造反派兔死狗烹、卸磨杀驴的严酷事实。还有人继续囿于官方的政策条文，力图分辨自己挨整的是非曲直。本书跳出了毛泽东语境，力求以开放的眼光，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山西的文革是中国文革的一部分，文革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把山西的人和事放在中国文明史和人类文明史的长河里考察，放在全球政治的各种形态中比较，才能扩大研究视野，登高望远。本书在这方面的努力值得赞许。

文革发生时，我是北京的一个初中生。到山西插队时，正值武斗高潮，此生第一次听到枪炮实战之声。后来到山西省委机关工作数年，对各派政治力量角逐之惨烈，有了近距离的切身感受。文革在山西，从华北会议，到清理“三种人”，十几年间折腾的回合特别多，以至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翻烙饼”。打倒“四人帮”，并不意味文革结束。1976年到1978年的清查运动，成为山西文革的又一波高潮，受伤害的干部群众多达几万人。后来整党和清理“三种人”，仍然是文革不可分割的尾声。这十几年的山西政坛，就像一台不停转的绞肉机，当事人不是充当刀片，就是充当肉片；或者先当刀片，再当肉片；当了肉片，又当刀片。我当时虽有厌恶之感，尚不能看清其根源所在。后来才明白，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没有民主宪政，岂能告别政治生活的噩梦。从这个意义来说，今天研究文革史，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是寻求走向未来的启示。■

【序 跋】

民间编写文革史的可喜成果

——《文革在山西》序

何 蜀

文化大革命前曾流传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歌唱的是山西的自然风光和人们在建设新生活时的精神风貌。那部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续集之前的那部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映后大受欢迎，因为观众们都热烈关注影片中那些人物后来的命运，所以又拍了这个续集。续集电影的反响没有前一部那么大，也许电影对那些年轻人命运的安排不大符合观众的期望或想象吧？不过，无论是电影的创作者还是广大观众当时都不可能想到，那些“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再往后的命运将会遭遇怎样的变化。

就在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上映三年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改变了一切。过去的人际关系全部被扭曲、破坏，不管是“我们村里”还是“我们城里”、“我们学校里”、“我们厂里”的人们，也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甚至老人、小孩，一个个都被卷入了疯狂的“七斗八斗”、你死我活的“大革命”之中。不仅“六亿人民都是批判家”，而且各地都从“批判的武器”迅速演变为“武器的批判”，打起了被最高领袖宣称为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的“全面内战”。

当我读这部书稿时，心头不时会响起那熟悉的《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歌声。歌声是优美动人的，电影展示的生活也是快乐美好的，然而那毕竟是经过艺术家们按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和善良天真的愿望而加以美化的生活，并非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

而这部沉重的书稿，则向读者生动地再现了文化大革命中山西人所经历的天翻地覆，血雨腥风。

文化大革命中的山西，的确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其最突出之点，一是造反夺权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武斗异常惨烈，三是

所谓“大寨红旗”的样板给全国农村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性灾难。这几方面的历史真相，在本书中都有详细的记叙和反思，而这些内容在以往的官方史著中是很难看到的。

提到文革中的夺权，无论官方史著还是受官方宣传长期影响而形成无意识表达习惯的民间回忆中，往往都爱说“上海一月革命”、“从上海刮起的一月风暴”，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准确的说法。所谓“一月革命”夺权中，山西省的夺权才真正是“全国第一夺”。在山西夺权“大功告成”并得到中央公开承认和宣传之后，上海的夺权还处于“乱世英雄起四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状态，一次次的自发夺权都遭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否决、打压，根本没有在1967年1月里完成对上海市党政领导机关的夺权和“新生红色政权”的建立。在整个“一月革命”时期，因为毛泽东为首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无真正的“战略部署”，甚至到底应该是接管、监管还是夺权都曾一度意见不统一，对于到底哪些地方、哪些单位应该夺权，应该怎样夺权，都没有明确的指示和规范性的要求。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出那个号召全国夺权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时，也没有提出什么具体可行的方针、政策、规则。因此，最早得到中央承认和宣传的山西夺权，就自然成了夺权的“样板”，全国其他地方的夺权，许多都是参照山西的做法，甚至连夺权公告之类文件中的条文也基本上是照抄或模仿《人民日报》发表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中的文字。

然而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长期以来在官方史著中却看不到。无论是党史还是国史、地方史，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大段“史无前例”的历史，不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就是只有“宜粗不宜细”的“干巴巴的几条筋”。

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当历史真相在官方史著中缺失的时候，也只能“求诸野”，求诸民间的著述了。近年来，各地都不断有文革亲历者写出了回忆录或口述史，为后人提供了研究文革历史的十分珍贵的材料。不过，那些出版物或自印书、网络文章，大都是从个人角度来记叙文革经历的，而像《文革中的山西》这样由一批亲历者集体回忆、集中反映一个省的文革全程历史的民间史著，似乎还是第一部。

本书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批当年造反派人士的集体回忆，比起已经问世

的许多原造反派人士的回忆来，更多了一些对文革的反思。而这一点，对于原造反派人士来说是很难的。因为在文革结束之后，原造反派几乎无一幸免地先被定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帮派骨干”，后又被定为“三种人”，普遍遭到严厉的批斗处罚，撤销职务，开除中共党籍，有的还遭受多年的牢狱之灾（其中不少人是由执法机关抢在新《刑法》生效之前的1979年底“省略”掉应有的法律程序突击宣判的）。实际上，加给他们的许多罪名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就拿“帮派体系骨干”和“追随‘四人帮’造反起家”这两大主要罪名来说，在1966秋冬到1968年底的群众性造反运动期间，各地的造反派都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令、支持下诞生、发展的，许多地方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是得到毛泽东欣赏、周恩来公开赞扬并在毛泽东批准发布的中央文件里肯定为“革命群众组织”的，许多造反派代表人物是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通过后报请毛泽东批准成为各省、市、自治区“新生红色政权”中的“革命群众”代表和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那时并无“四人帮”，当“四人帮”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内形成的时候，文革中的造反派除了个别进入权力机构的象征性代表人物外，已经不存在了，怎么能把造反派说成是“帮派体系骨干”？当年他们造反都是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起来向“走资派”造反、夺权并得到其承认和支持的，怎么能说是“追随‘四人帮’造反起家”？……因为这样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许多原造反派人士都在含冤负屈的物质与精神重压下失去了冷静反思历史的条件和能力，有的甚至担心在自身蒙冤的情况下进行反思、反省会坐实了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于是，我们在原造反派人士的回忆录或口述史中，见到的多是对那些莫须有罪名的自我辩护，而很少见到对自己文革经历的反思、反省，更别说忏悔了。还有不少原造反派人士只选择性地记住了毛泽东对自己当年造反的肯定和支持，却固执地不愿正视造反派正是在毛泽东的权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在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清队”、“反复旧”、“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文革“部署”中遭到排斥、打压，被“卸磨杀驴”的残酷事实。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文革中的山西》这样达到一定的认识高度和反思力度的民间史著，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一年多以前，通过北京的朋友丁东联系上了山西的李辅先生（丁东曾是李辅任副主任的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成员），读到了李辅先生的长篇回忆录《所思

所忆七十年》，了解到了这位当年山西文革中省委机关的年轻干部如何成为造反派负责人，又如何成为两次担任县委书记的政坛“新星”，以后又被当作所谓“三种人”撤职并开除中共党籍的人生传奇。随后，从李辅先生处得知他们有一个团队在集体回忆、编写山西文革史，并通过他的介绍结识了这个民间写史团队的执笔人石名岗先生。在最初读到书稿的几个片断时，就感到其史料丰富，文笔生动而且蕴含较深刻的反思，于是征得他们的同意，节选了部分内容发在我编的电子刊物《昨天》上。现在终于读到了经反复修改后的全稿，欣喜之情不言而喻。这部著作，与作家赵瑜写晋东南文革大武斗的长篇报告文学《牺牲者》和作家孙涛写山西另一大派群众组织“兵团”的负责人刘灏传奇经历的长篇报告文学《虔诚与疯狂》，构成了全面真实反映山西文革历史的生动画卷。

正在写作此文时，又看到了一批原广州文革亲历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编写广州文革史座谈会的消息，令人鼓舞。同时，又读到湖南的文革研究学者陈益南的信，信中表达了我们共同的感慨：

二十多年前，我曾很担心文革的历史真相，会被官方及主流媒体的片面说词所抹杀、所曲解、所抹黑，让文革中的那么多真实岁月，永远遭到尘封。

然而，由于包括你我在内的大家一道努力，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不论人们如何评价那段历史，但，文革历史的真相，已通过民间千千万万的文字与资料的建设，牢牢地屹立于史册而不会如烟了！

想到这一点，我就自觉很是欣慰！

我也是怀着这样欣慰的心情，写下了这篇文章。■

2014年12月2日于重庆风江阁

【述 往】

插队的那些事（十一）

——夜半对歌

朱 特

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歌声。好像有人说过音乐是人类的第二种语言，我想这应当包括歌唱。许多无法用话语表达的情绪可以借助歌唱传递，比如爱情。知青点里年轻人多歌声也多，在单调乏味的插队生活里唱歌是唯一的娱乐，也是枯燥生活中的点缀。古人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背井离乡身世不同的知青们在自娱自乐的歌声中，掺杂着更多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雨村知青爱唱歌，人人会唱个个爱唱。唱着歌儿到雨村就是明证。旗里开全旗知青大会，晚饭后雨村男知青10条汉子在察素齐的小胡同的土路上，在昏黄的路灯下齐声高歌：雪山呀霞光万丈……歌声灌满整条小胡同，大青山下古老小镇荡漾着青春的气息。就连不爱说话的包四兄也曾引吭高歌：……就会有邮递员来传情……竟也字正腔圆。那会儿官家处处批封资修，把老百姓喜欢的歌曲统统批判禁唱，偌大的国家变成了文化沙漠，但在天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知青们不管那个，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我也爱唱，不过是瞎唱。在学校时听人说有一本《外国名歌200首》里面全是黄色歌曲。好奇心大动，想方设法地“顺”了一本，却是少头没尾，虽说五官不整但基本内容还都在。看看里面的歌词，无非花呀草呀姑娘呀也实在看不出黄在什么地方。那里面的歌我一首都不会唱，却也没舍得扔了它，不想鬼使神差带到了雨村。

几位高中生看我还有这么一本小册子，高兴了。三哥半躺半靠在被子上，从第一页开始一连唱了十几首不带打嗝的，一下子把我震住了。二饼子向我亮三哥的底：这点歌对他算什么。除包四兄很少发声外，二饼子和力兄都能把《200首》里面的歌曲唱得有模有样，好听。

三哥唱歌好听，连老乡们都爱听，说三子唱歌最好听，噢噢的跟牛叫似的。那是三哥的低音好，老乡不懂，评价起来就特直观感性。我拜三哥为师，得空就

跟三哥学两嗓子，有时也自己哼唱，这时二饼子就会指点：你听听老三怎么唱的。我就听就品，虽没有品出个什么，但日久天长也学会了排谱。就此明白了，会唱二百首真也算不得什么。

却说有一天女同胞那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了得，是名人之后（其父作品曾入初中课本），会俄语，能唱原版的俄罗斯歌曲。那一晚我就领教了。

来了客人的女同胞们自然高兴欢喜，到了该入睡的时候还听见隔壁女生宿舍里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那话题可能一个接着一个，我、三哥、包四已经挨肩躺下，还听见隔壁厢依然是笑语喧哗。就在睡意朦胧中，耳畔突然响起一阵歌声，我一听来了精神。这是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我才从三哥那里趸来的，时间不长，这旋律在我这里还热乎着呐。可今天觉得外国味特浓，竖起耳朵一听，原来人家是用俄语唱的，怪不得呢。可能是客人在教唱，这歌唱了一遍又一遍，不过在“打死位大娘妈妈”那，唱得和三哥不一样。我问三哥，她们唱错了吧？不只是三哥，就连包四兄也说唱得不对。

隔壁歌声还在继续，黑灯躺在被窝里的三哥似乎浑身难受，嘴里说这不对呀这不对。发小王三儿给我讲过一个指挥家的故事。说是一天夜里，住在指挥家隔壁的钢琴家弹奏了一支曲子。曲子弹得很好，让指挥家很受用，但这位钢琴家唯独留下最后一个结尾音符不弹就洗洗睡了。指挥家听不到结尾音符，难受得怎么也睡不着，最后钻了被窝的指挥家来到钢琴边把那个音符狠狠地敲出来，才回到床上平心静气地睡了觉。此时三哥的心境堪与指挥家有一比。他拉亮了灯依然说不不对呀这不对。我和包四也起哄说，这哪儿是唱歌呢，纯粹是给人上刑。我说，三哥你教教她们。对，老三你教教她们。包四也在被窝里鼓动三哥。

按照一般情况，敲敲墙说一声：女同胞们，你们的调子跑到大青山去了，也就结了。可在雨村男女知青之间不行。到此时虽然相处已经有两年多，但男女之间依然界限分明，除公事外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已经起身而坐的三哥习惯性地拍拍脑门，对我和包四说，坐起来我们唱给她们听。好主意，高！只有三哥能想得出来。我和包四立刻起身披衣而坐。三哥清了清嗓子，起了头，做了一个手势示意我们大声唱。平时很少唱歌的包四这回也扯开嗓子唱了起来，就更不用说三哥和我了。在女同胞跑调的地方三哥还特意加强，歌声在沉静的雨村里传得很远很远……

一遍下来，三哥说再来一遍。我们又唱了一遍。唱完，三哥意犹未尽，说，事不过三，再来一遍。三遍过后隔壁没有了响动。我们暗自发笑，重又回到被窝。

安静的时间不长，隔壁歌声再起，还是同一首歌，唱到关节处错误依旧。三哥没辙了，拍着脑门说：死教不会，死教不会，朽木不可雕也。我笑了，想想，说，也许人家还认为我们唱错了呢。三人大笑。

第二天，早上出工，队长坏坏问我们：“昨夜个发甚神经哩，哇哇地叫唤个不停？”哥仨又大笑。■

【述 往】

我丧失过阶级立场

安希孟

曾经，我们只站在阶级立场上说话，没有个人的立场和世界观，没有个性，只有共性(并非全人类人性，而乃阶级性、党性。党性哪里去了，就是指党的立场)。这当然就是永恒正确，永远把握全部的宇宙真理——然而我们毕竟是肉身凡胎，生活在现实世界，总要追索，总有错讹。这就有了个性。你永远是你自己，而不是大写的普凡的抽象的党性和阶级性的化身。个性就是个人主义，似乎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就没有个人的烙印。没有错误的人是仙界神仙，没有七情六欲。可我们，看见蟠桃就馋涎欲滴。

1969年清查516反革命集团，因为伟大领袖发号召，我们对516充满刻骨仇恨——我们总是相信群众相信党。让董连猛交待67年92黑会(不是92共识)，那是夏末初秋，天气炎热，大家还穿短袖短裤赤膊上阵，没有空调，没有电子扇，但有蚊虫饕餮。我们要董连猛交待92黑会，这压根儿也许就是莫须有的伪命题。大家轮番上阵，让一部分人先吃饭先饱起来，其余的人继续斗，让他铁桶倒豆子。快七点时，连续站了五个小时的董连猛大概头晕目眩，敌不过革命群众的车轮战术，说，“我招了”。工军宣队老王宣布大获全胜，鸣金收兵：“把董连猛押下去”。董连猛甫一出111教室，就嚎啕大哭，人困马乏的我们，赶快去吃最后的晚“餐”。那天下午，我始终坐在批斗会的最后一排——我这习惯保持了一辈子，

开会坐门口，随时开遛。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没有拍桌子打板凳大呼小叫，因为，我于此不在行。

后来给董连猛办学习班，就是隔离审查——这玩意儿拿法制观念无法解释，和劳教制度差不多。这名称很优雅——不信给你办两天学习班试试？我也算董连猛专案组吧？反正看管董连猛，看守监督。我起初也怀疑董连猛有弥天大罪，重案在身，后来越来越觉得我自己曾经和反革命也差不多，就是怀疑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嫌周总理有些儿温和。况且董的反革命罪状也就那说重不重的几条。每天吃、喝、睡，围攻一交待一散摊，用革委会曾经对付别人的法子对付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时，革委会让牛鬼蛇神太阳下游街示众，有老教授就昏倒在地。董连猛不觉无聊，我倒觉着无聊，成天就是朗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每日看管董连猛，我都烦了。这分明是董连猛给我们办学习班，关我们的禁闭。我特别希望从笼子里得到解放，打心底里念诵：“无产阶级安希孟只有解放董连猛，才能最后解放安希孟自己”。有一天，董连猛要喝水，我说咱们到主楼旁开水房去。这样，董连猛就给我放了一次风。

在主楼水房打上凉开水，我意犹未尽，说，我俩坐一会儿。他这才说，“我觉得你人不错，我给你说实话，根本没有 92 黑会什么共识，我当时头晕眼花，腿都站乏了，没办法，就招了。”其实我知道，反革命分子都是这样逼出来的——胡风，糊涂了，就疯了。于是我说，这些你完全可以对领导一切的工宣队叔叔说。这事我不说，你自己说。因为寡人深知，我说了不算，还得他说。当然你说也是白说，因为斗争哲学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谁相信虚无呢？言“有”易，言“无”难呀。你又不是道家和佛家。你要是道家和佛家，保准不能统御一切。你那时要汉奸特务交代，也是捉虱子心态，不是吗？

于今思之，92 黑会，容或有之。林杰倒台如鸟兽散，开个黑会，惊慌失措，惊弓之鸟，发点牢骚，还不行？可是，一个社群，怎能如此水至清人至察呀！几个娃娃，面临政治局势突然逆转，日薄西山，人命危浅，发牢骚，凑情况，对暗号，表示很不理解，比如二月逆流跟不上战略部署伟大，也是可以理解的。

97 之前的黑会，照理，也是天赋人权。不打不抢不烧，有何不可？“天赋人权”这无限美好的概念，把人类推上历史的火箭飞船，我们感谢民主自由宪政普世价值吹进吾人心田。我们尊重人类如今的道德秩序。曾经，“小爬虫”，“变色

龙”，运动初期是骂“狗崽子”，“滚滚滚”，“滚他妈的蛋”，“他妈的”国骂盛行，平日斯文的女子也张口“操”。日常是不经意说出的，彼时格外嘹亮。文革初的8月，烽火连天，红五类有权谩骂“黑五类”“狗崽子”，因为二者地位不平等——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早被当作温情脉脉的面纱撕破了。天赋人权让道于人赋人权。北工大谭力夫讲话极具魅力，那口才辩才堪称上乘。中学生幼稚，冲到师大广播站骂“臭大学生”太温情。鄙人在此想说的是，文革中保守派逍遥派中间派温和造反派极端造反派教师队伍，大家几乎无一例外被笼罩在极左思潮的妖氛雾霾里。你不可能摆脱时空局限。认识到这一点你才能跳出文革三界外，脱离魔咒。

可是我终因丧失阶级立场，“被”走出了看管小组。我就被从监押小组清除，被解除“关押”！后来知道，五一六组织的确存在过，那是幼稚的被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怀疑周恩来。但是这个组织人数很少，而且决不是坏人。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我自己就恨不得能看到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可惜没有看到。

因此人人有过错。我不是错误人人有责。该负责的就负责。有的人良心未泯。小时游戏，多数比较文明，捉迷藏最为常见，偶然有战争战斗打仗事，都是受文宣影响。小伙伴们狗仗人势也大喊“缴枪不杀”“冲啊”“给我上”“抓活的”“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打气”。及至长大，在北师大武斗，咱非党人，也自作多情俨然以八路自居，不知羞耻，以党化身出现，好像在红旗杂志就代表党。1968年董连猛师长率领兵丁攻打北师大工五楼，夜晚值守防兵团潜逃。凌晨兵团同学(彼时叫战士)逃窜，我责问陈毅文同学为何不把暖气片推下砸死他们，陈毅文说，“朕于心何忍哉”。我刷地脸红了。1968年春，京城高校部分造反组织炮打谢富治。然而炮打司令部，并非弹无虚发，刀刀见血，有时弹着点就落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房顶上了。这一次“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的宝押错了，杨余傅被当作“变色龙”揪出，连同1967年秋被揪出(揪，文革特有词汇，揪住人的后衣领把人拎起，这动作今已不见诸罪囚)的王关戚“小爬虫”，共两类动物——人属于动物王国。倒谢积极者，为北京高校天派和三军无产阶级造反派，大家同属一窝。北师大井冈山造反兵团属这一股，他们也叫井冈山，为嘛？因为当初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就是他们始作其俑，谭厚兰上山后翦除王仑王佐们伙拼他们？，董连猛当初还在伪红卫兵师任军职。王颂平李先华蒲寿章等井冈山“元老们”被赶下山，又另立井冈山造反兵团。这次“倒谢”，史称右倾翻案妖风(迷雾)，

又叫黑风，一定是黄沙翻滚——你懂的。杨余傅被抓，造反兵团倒谢失败，龟缩工五楼，于是有了井冈山掌权一派四二一攻打包围工五楼一役，比林总包围长春，城里百姓不许出城一个麻雀也飞不出略显逊色。但井冈山革委会董连猛指挥武斗豪气干云断水断粮断电，也不亚于林总。汽车轮胎制作强力弹弓向工五楼窗口发射，我初中学的“弹洞前村壁”如今被坐实。长茅剑戟发出寒光。被包围在楼内的井冈山造反兵团官兵弟兄们哀怨歌声“抬头望见北斗星，黑夜里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凄婉动人。在他们，一定动容，忧容惨淡，长泪汨汨，但中南海毛，此时此刻早吃了安眠药，遁入黑甜之乡。

我反对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教，因为吾人心中都有向善或向善的种子。在扣押董连猛期间，我无聊的时候还下山摘桃。安希孟绝对不是正人君子（那是伪君子）。1970年动乱岁月收尾，毕业，但奉命抓捕516敌特分子，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因为顽固分子顽而不固。敌人越多越好，战士心态可以理解。但后来自己差点被抓成偷桃贼。风华正茂，在文史战斗间隙，辄觉无聊。那个运动就是让无所事事的人互相掐架。后来，一面革命一面偷桃——在中国，人人都是革命者爱国者，大道理朗朗上口。图书馆前，主席像侧，桃李满园。李子熟了，红果压枝，叫人馋涎欲滴。有一次批斗五一六完毕，我和李杰、唐学芳回餐厅吃饭，顺便偷摘李子。你要知道李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不能只听书上说的。这是伟大毛的教训。我贪心，攀爬到树上。唐学芳只在树下折枝勾果。忽听李杰说，“我不管，人家来人了”。我没在意，但说时迟，那时快，果然借眼角余光测得人影：有人来抓捕。我猴急，跳下树，撒丫子就跑。唐学芳不敏，只听那人从背后抱往他说：“我可抓住你了，你跑不了啦”。我心惊胆寒，一口气跑到文史楼三楼，稍作喘息，神闲气定，再从容自得地下楼，装作是正派人，悠悠然若无其事，心想，你即使在楼里看到我，也未必认得“真凶”。我又没留下DNA。但做贼心虚的古训，还是体会到了。忐忑呀。那个运动就是让人吃饱了撑的。后来毕业分配当了老师，我俨然正人君子教训学生，不可下山摘蟠桃学蒋介石。人有两面。

如今号召再来一次文革整人，抓辫子，其用心远逾“清污”“反对自由化”。同志们，我们大家都一样，若抡棍子抓辫子扣帽子，斗争成风，那就谁也逃不脱——连王关戚杨余傅陈伯达副统帅也逃不脱哦。中宣部若有胆量搞运动，中宣部首在打倒之列。殷鉴不远：犬吠狺狺，打手比主谋出手更歹毒，走狗比指使者更

积极，奴才比主子更凶恶。

依法治国，法治，宪政，是四人帮被粉碎后，鉴于无法无天反党乱军祸国殃民提出的。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忽然祭起阶级斗争法宝。以宪理政，党和阶级、社团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彭真老说的“人人”，就是 all people, everybody。党也要奉公守法，秉公执法，不能超乎法律之上。以宪理政，就是不在宪法外另立罪名。无产阶级也守法，无特权——但专政却是一部分公民拥有压倒另一部分人的特权，五星红旗上五颗星有两颗被撕裂。法治，无论如何难以和阶级格斗，孤立、打击、围剿某个阶级阶层，打杀另一部分公民，不管有罪无罪，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的做法相一致。把一个阶级整体当作敌囚，无视其成员个体奉公守法与否，整体地当作阶级敌人的概念，未经事先封闭，拿一个开放的概念，好比张开的口袋，把自己不中意的人随长官意志往里装，这是一个在操作中随长官意志任意周延的概念。在实际生活中，资产阶级无一定内含，其外延无边无际，无影无踪，给捕风捉影留下空间，斗争者有无限想象力，曾经的无产阶级刘邓林陈，菊香书屋座上客随时成为南冠囚徒；王关戚王张江姚，曾经的无产阶级，忽地成资产阶级小爬虫。

两极相通，北师大文革诸派，只有大门石狮子是干净的(可惜北师大没石狮)——连树木也因被钉上芦席贴诬陷的大字报因而被钉上十字架，脉脉含羞的小草也昂扬着作和声，白云悠悠不肯怜悯虫蛾而良知受玷污，地上的尘埃被牛鬼蛇神们的汗渍污染。那些一贯正确者，因冷漠地作壁上观，游离于外桃花源中而良心受煎炸。工宣队本是局外人，本应折中，但也频频制造冤狱窦娥，其整人手段亦毫不逊色。 ■

【资 料】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1967年2月22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您的最忠实的红卫兵，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红司令，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敬爱的毛主席，今天，我们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您报告我们战斗的喜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三个司令部的革命派在战斗中胜利会师了！我们团结起来了，联合起来了！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啊毛主席，当我们回顾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历程的时候，我们怎么也倾诉不尽对您的无比崇敬和无限热爱。

是您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是您英明地发现了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红卫兵。

是您的亲切关怀和精心培育，红卫兵才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还是您，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打击革命，围剿革命派的严重时刻，为我们驱散了弥雾，拨正了船头，指明了航向。在您的光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更加心明眼亮胆子壮，造反，造反，再造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了个落花流水，把牛鬼蛇神杀了个人仰马翻。

敬爱的毛主席啊，如今，革命的航船正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革命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的狂飚，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新曙光，送来了一个又一个喜报。牛鬼蛇神胆颤心惊。革命群众拍手称快。但是，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

扎。”他们正在和我们进行拼死的斗争。就在这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进行决战的重大历史关头，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按照您的教导，克服了重重障碍，团结起来了！联合起来了！我们将团结一切革命同志，联合一切革命力量，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向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盘踞的堡垒，发起全面的猛烈的总攻击。向他们夺权！夺权！夺权！把一切大权夺回来！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使人民的江山永远通红通红！

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深深地懂得，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世界革命人民的心脏，这里更不能容许任何牛鬼蛇神兴风作浪。我们一定要奋起千钧棒，把他们打倒在地，叫他们翻不了身！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在首都的上空高高飘扬！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要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坚决打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句话：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打倒“私”字！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我们要做革命到底的战士，决不做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人物！我们一定要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一个更广阔、更深入、更高级的阶段。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新功、立新劳！我们一定遵循您的教导，实行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并肩战斗，共同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您最忠实的红卫兵。我们对您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八九个月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困难时读了您的书有力量，迷路时读了您的书知方向；无论阶级敌人多么狡猾，无论阶级斗争多么复杂，只要按您的教导办事，我们就一定能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

我们向您老人家庄严宣誓：一定要一辈子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一辈子跟着您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做一个坚强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头可断，血可流，您的革命路线永不丢！您的光辉思想永不丢！谁不执行您的革命路线，我们就造谁的反！谁敢诋毁您的光辉思想，我们就专谁的政！谁敢反对您，我们就打倒谁！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无产阶级！中国的前途是我

们的！世界的前途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全世界！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资 料】

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1967年3月22日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永远忠于您的首都革命职工，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和无限的喜悦，向您老人家报喜：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胜利召开了！首都革命职工联合起来了！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首都革命职工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大造了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首都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战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的光辉历程，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们遵循您老人家的教导，坚决实行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我们首都革命职工沿着您的光辉思想照亮的上海“一月革命”的道路奋勇

前进！我们一定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坚决的夺权斗争，把他们所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地夺回来，把他们所盘踞的反动堡垒一个一个地攻破，把旧北京市委、市人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打倒！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就在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时刻里，就在这战鼓咚咚、凯歌阵阵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看到了《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真是心情无比激动，浑身热血沸腾。这是您向我们发出的新的动员令，这是夺取革命和生产双胜利的进军号，我们首都革命职工一千个响应，一万个拥护！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还在，心不死，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疯狂地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反扑，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的伟大成果。我们一定要高举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垮、斗倒、斗臭，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抓革命，促生产”是您提出来的伟大方针，我们首都革命职工坚决照办！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我们首都革命职工一定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坚决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挥动巨铲，抡起铁锤，大干特干，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当抓革命、促生产的最出色的模范。

敬爱的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紧张战斗中，您派来了人民子弟兵——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我们，这是您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我们首都革命职工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好好学习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业生产的双胜利！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您老人家亲。敬爱的毛主席，是您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敌人的统治，当家作了主人；是您领导我们粉碎了党内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使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是您为我们驱散了迷雾，指明了航向。我们对您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为了保卫您，为了捍卫您的光辉思想，为了捍卫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任凭风险浪恶，我们工人阶级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战士。我们要边战斗，边整风，在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同时，坚决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打倒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反革命经济主义、行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一辈子保持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本色，永远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革命职工是顶天立地的革命造反者，天塌下来我们能顶住，地陷下去我们能填平。有您的英明领导，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钢铁般的联合，我们就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的新奇迹，就能彻底破坏旧世界，建设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让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全北京，全中国，全世界，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最最衷心地祝愿您，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资 料】

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您最忠实的红卫兵，高唱《东方红》的颂歌，迎着东升的红日，满怀无限幸福、无限崇敬的激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司令，报喜来了：

我们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您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歌声中，在您的身边，光荣诞生了！我们热烈欢呼，我们纵情歌唱，欢呼以您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胜利！歌唱您光辉思想的又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

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司令：

是您亲自点燃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是您敏锐地发现了刚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出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红卫兵幼苗，您的坚决支持和强大声音，使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像迅雷滚滚，像海涛澎湃，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是您交给我们最锐利的战斗武器，使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同广大工农兵一起，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了出来；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和疯狂反扑；我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杀出校门，走向社会，大破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改变着我国整个社会的面貌。是您和您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副统帅，一次又一次检阅了红卫兵的强大队伍，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您带领我们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是您的阳光和雨露哺育我们在斗争中茁壮成长。所有这一切，怎能不使我们从心坎里发出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回顾过去艰苦奋斗的历程，浑身是胆；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更是信心百倍。在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下，我们中等学校红卫兵，冲破重重阻力，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了！团结战斗在一起了！

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司令，我们红卫兵深深意识到自己任重而道远。我们坚决遵循您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坚决实行您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发扬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掌握斗争大方向，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据的阵地统统夺回来，把这些反动家伙斗倒、斗垮、斗臭。我们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流毒，把它的社会基础连根拔掉。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我们要坚决保卫您，保卫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

路线决战的新阶段中，您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战斗号召，我们红卫兵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坚决响应，坚决执行。我们要牢记您的教导，努力创造条件，实现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彻底完成学校的一斗二批三改的历史使命。让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占领中等学校的一切阵地，使中等学校成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红色堡垒。

我们坚决遵循您的教导向人民解放军学习，以人民解放军为榜样，活学活用您的光辉著作，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大造私字的反，大革私字的命，把我们的组织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后备力量。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司令，请您老人家放心，在您的指引下，我们经受了战斗的洗礼，我们也一定能够接受更大暴风雨的考验。枪林弹雨吓不了我们，糖衣炮弹打不倒我们，阴谋诡计更骗不了我们。我们有坚强的信念，我们有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我们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到底的壮志豪情。我们决不做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我们誓做全心全意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世界革命人民服务的永不生锈的革命螺丝钉。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请您老人家放心，我们这一代一定要亲手埋葬帝国主义，扫除一切害人虫，保证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您是人民的希望，您是革命的灯塔，您的伟大思想是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我们红卫兵誓以您的思想为指针，把您的思想落实在行动上。我们向您宣誓：生，为保卫您的光辉思想而战斗；死，为保卫您的光辉思想而献身！永远忠于您，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海枯石烂，永不变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谁要是反对您，反对您的光辉思想，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司令，千言万语，万语千言也说不完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让我们高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千遍万遍地祝愿您老人家，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原载中学红代会《兵团战报》1967年3月27日）

【读者来信】

1. 江东、郑大丰、元元谈《记忆》的封面设计

贵刊教育专辑的封面很有特点，特别是第五期教育增刊封面（总130期）非常有视觉冲击力。单一的红色背景前，那些手持红宝书的影像，没有五官只剩下红色的人脸群像。这一画面带给人很多联想：文革当年，响应号召造反的学生的脑海里，除了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是三忠于四无限的个人崇拜。革命群众思想被掏空，成了任人操纵的木偶。贵刊封面的设计，以令人触目惊心大胆造型，突出了这一时代特点。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不能不叩问当下：当年那些空洞的心灵，麻木的面孔醒来了吗？

江东 5-18

作为一个美术编辑，我一直在悄悄地注意着《记忆》的封面。我把它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没有寓意的自然风光，另一种是有寓意的艺术构图。前者占大多数，它们大多数没有设计感，只是一幅雅致的画面而已。只有极个别的封面有所寓意。如女附中那几期，在黑色的画面上出现一个或大或小的洞口，这种构图似乎象征着文革的历史如漆似夜，今天的人们要寻找真实，就只能通过洞口向历史窥探。遗憾的是，这种东西太少，大多数都只是好看的图画。（尽管编者的眼光不俗，但是没有喻意，就不耐看）。有寓意的封面是今年才成批出现的。集中在教育专辑和北大专辑这几期上。这些封面都颇具匠心，看得出来，设计者（用行话说就是美编）在努力地在画面与内容之间建立起某种有意味的关系。我把这几张构图转给了几位同好，他们都点赞不已。但也有人担心要将目前这种风格保持下去有一定难度。

郑大丰 5-27

构思巧妙，寓意深刻，为教育专辑的刊头点赞！

在这种设计面前，这边厢的美编们一定很难过很悲催吧！哈哈！

元元 5-29

2. 本刊编辑部说明并致歉

(1) 2015年5月11日, 叶维丽从波士顿致信本刊, 简评唐少杰的《清华工宣队》一文。本刊将此信刊于130期“读者来信”之中。叶维丽的来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天看了最近一期《记忆》, 觉得唐少杰的文章真是很好, 好在不但清晰地讲述了清华的事, 而且以此为‘脖领子’, ‘领起’1968年7月直到1976年秋的若干重大事件。”这里的“领起”应为“拎起”。此误植责在本刊编辑, 与叶维丽无关。特此说明, 并致歉意。

(2) 130期唐燕的《〈小美人鱼〉和我们所缺失的爱》一文在第二幅插图附近的文字, 因本刊编辑排版不慎, 出现了将插图说明中“恋恋不舍”误植于正文之中, 将“资源平等”一词从中间隔断的差错。经作者指出, 特更正如下:

其原文应为: “西方人还认为, 爱的境界高于良心更高于道德。有爱, 道德才有底线, 才不会胡作非为, 才能化解苦难和怨恨, 抵消掉人性里的丑陋恨恶。没有爱, 人性就被扭曲被泯灭。人人都有爱, 彼此间才不会歧视和被歧视, 才能



有生而平等的理念, 才能人人都享受到自由平等的权利; 也只有每个人都享有资源平等、教育平等、机会平等, 才会有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爱和被爱还能使我们‘免于恐惧’给人以心灵以安全、宁静、祥和和慰藉。(左图: 这是小演员们高兴地在舞台作

最后的合影。两周的集体生活从互不相识到结下深厚友谊。恋恋不舍。)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